

目 录

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7—1937·7)·····	(42)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78)
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11)·····	(112)

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1919年

5月12日

《国民公报》首次披露北京“五四”运动消息，各界輿情激奋，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先导，立即奋起响应。

5月20日，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县中学等校学生代表五六十人集会，“痛陈时弊，谋振兴之法。”并决定致电联络京津各团体一致行动。

5月24日，各校学生代表再度集会，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发表《救国团宣言》和《哭告同胞书》，并通电全国，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川东一些县相继响应，成立学生救国团分部。6月28日，川东学生救国团改名川东学生联合会，并与北京、上海等地学联及川籍旅外学生建立联系。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川东学联是重庆和川东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织。川东学联主办的《川东学生周刊》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27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渝女师）学生“本匹夫有责之义”，发起组织“川东女子救国联合会”，宣称“密约不废，青岛不还，国权丧失，万劫不复。”表示“虽弱女子，岂可坐观国亡？”

6月3日，在川东学生救国团组织下，全市20所中小学校学生2000余人，响应北京学生的罢课宣言，举行游行警告大会，强烈要求还我青岛，惩办国贼，取消密约，抵制日货，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并到东川道尹公署和重庆镇守使署请愿，向全国发出通电。

6月12日，重庆总商会召集各商帮开特别会议，商讨提倡国货，一致对外事宜。在此前后，总商会曾多次拒绝日本驻渝领事提出的维持日货的要求。各商帮拒付对日本洋行领订货银30万两。苏货帮商定出抵制日货的具体办法，规定如查出私购日货，罚款10倍，并登报宣布为公敌。

6月14日，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这是以市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联合团体，规模较大，与川东学联配合，在“五四”运动初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6月22日

由商界和学界团体组成的“商学联合会”成立，宗旨是“提倡国货，维持现状，联络商学界一致进行。”主要任务是协调商学两界在抵制日货中的行动，协商处理违背约定、购销日货商人的事宜。商学联合会曾发挥积极作用，维系两界联合行动抵制日货坚持达两年之久。但学生与部分商人立场时有不合，以至发生过冲突。

9月中旬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入校学生100余人，来自川东20余县。这是上月成立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创办的学校。重庆商绅人士给予赞助，巴县地方亦给予补助。

次年7月学业结束，邓希贤（小平）、冉钧、周文楷（贡植）、傅汝霖、江泽民等84人，于8月27日起程离渝经上海赴法。在此前后，1919年11月下旬，江津、巴县、长寿、南充等地青年学生聂荣臻、帅本立、钟汝梅等35人经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帮助，由重庆起程赴法国。1920年11月，在广东留法学生、女律师郑毓秀的帮助下，巴县10名女青年赴法学习。

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有许多人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国后，有的回到四川、重庆，为中国革命和四川、重庆地区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9月下旬

重庆各码头工人拒绝给“联华轮”起卸日货。他们不理日本领事和巴县知事的交涉，表示：“因听学生演说我国受欺情形，愿与日商断绝交往。”部分码头工人在储奇门集会，表示以后不给日商轮船卸货。重庆工人开始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

11月17日

川东学联组织学生1000多人游行请愿，强烈要求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交出挪用公款廉价收购的80多箱日货。次日将查出的部分日货运至朝天门当众焚毁。四川地方当局被迫将

郑贤书撤职。

1920年

1月

巴县“青年进德会”在南岸成立，并发表宣言认为，在旧制度旧道德被抛弃，新制度新道德尚未确立之时，青年要组织团体来加强研究，互相勉励，以养成高尚的人格，洁净的品行；提倡思想进取而不保守，行为正当，向新的方向努力向前，日进高明；主张依靠青年自己的力量而不靠政府来组织公共事业、发展自己的意志。该会同时吸收女会员。

这一时期，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种社会团体纷纷成立。较巴县青年进德会稍后成立的有“綦江青年砥砺会”（常在重庆活动），“以德、智、体、实业四项为宗旨，以造就个人完全人格为目的。”有主张“救生事业、法制改良、男女平等、农村改造、土地国有、种族同化”的“重庆社会教育团”，以及“巴县青年砥砺会”、“社会服务研究会”、“益社”等；也有“主张工会主义、合作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宣传克鲁泡特金主张”的“重庆平平学会”和宣传通过“同盟总罢工”，以“攻击一切强权”的“人声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还有各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和以“培养读书能力，研究世界学术”为宗旨的各种读书会。

这些团体以适应潮流，研究主义，进德修业为目的，都大力反对旧礼教、旧制度，积极发展学术事业，接触各种思潮，探讨人生道路，谋求改造社会。其中一些人由此逐步成

长，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走上革命道路。

4月21日

川东学联在新丰街复升恒商号清查出大批日货，运至城外焚毁，并将商号老板卓云程胸前书写“亡国奴”字样，游行示众。

学生与商人矛盾日益深化，以后在抄查日货过程中，双方多次发生武力冲突。苏货帮曾关门罢市，各家派人手持木棒，联合组织“保货队”。棉纱帮招雇力夫200人，组成“保货队”。部分商人另组“商界联合会”，与学生对抗，并要求地方当局以武力解散川东学联，保护自由购货；认为视学、教员管束学生不力，由商人将视学涂花脸游行。

知识舆论界多支持学生；商界多支持被抄商户；地方政府从中调解，偏向商人。

上半年

重庆熟毛（猪鬃）业工人在喻合林带领下联合罢工，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和不另招学徒。经过半年斗争，取得胜利，并建立重庆熟毛业工会，喻合林任会长。

与此同时，重庆总工会成立，亦以喻合林任会长。参加总工会的有各帮工团40多个单位。四川一些县也陆续成立县工会，接受重庆总工会领导。

重庆总工会成立后与学生团体互相配合，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对发展工人运动起了积极作用。总工会骨干成员中有的后来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镇压“二七”罢工的刽子手赵文华、奉吴佩孚命入川，飭令解散重庆总工

会。

9月

省二女师开办平民夜校，校长和教师均由学生担任。

在此之前，巴县农校办的平民学校和华英平民夜校已在南岸弹子石创设。这些平民学校都是面向社会，对贫苦民众开门，男女兼收。这是青年知识分子力图推广教育、改良社会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年底

少年中国学会重要成员陈愚生到重庆，应聘为东川道尹公署秘书长。在东川道尹叶茂林支持下，撤换一批把持各中等学校的顽固守旧校长，改任一批新人任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校校长，并聘请一批在外地受到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各校任教和讲学。积极改革教育，如推行白话文，支持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允许学生有选择教师自由等。这对冲破因循守旧的教育传统，传播新思潮、新文化，活跃学术空气起了积极作用。

1 9 2 1 年

2月1日

陈愚生等创办的《新蜀报》创刊，宗旨为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早期的《新蜀报》是重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在此前后，一批进步报刊相继创办。主要有綦江青年砥砺会的《綦评》（1920年创刊，后改名为《綦民公论》，在重庆出版），重庆联中校友会的《友声》（1921年11月创刊），巴县砥砺青年会的《巴声》（1921年创刊），重庆联中益社的《渝江评论》（1921年创刊），重庆商学界的《商学半月刊》、陈愚生等主办的《渝社旬刊》，全川教育改进会的《教育改进社杂志》，重庆工界团体的《工务日报》，以及《平民日报》等。这些报刊以揭露和抨击黑暗势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有的已初步涉及到社会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团体人声社的《人声》和平平学会的《平平》，以及无政府主义文艺刊物《星星》也先后出版。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青年中曾有较大影响。外地的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亦传入重庆。各种政治、学术思想空前活跃。

4月

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吴玉章在重庆积极开展四川自治运动，以反对北洋军阀和军阀混战，并进行社会改革。3月，“全川自治联合会”在重庆总商会召开成立大会，100多个县均派代表参加。吴玉章宣布12条纲领，提出实行“职业的全民政治”、“直接的普遍选举”、“刘一的编练民军”、“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发展实业”、“组织各种协社”、“制定保工法律”等主张，试图实现“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的总目标。15日，全川自治联合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会议，吴玉章当选为国民委员会主席。

由于刘湘等军阀力图控制和利用自治联合会成为御用工

具，5月28日，吴玉章被迫将自治联合会迁往成都。不久即宣布解散。

5月

商学两界在查抄仇货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20日，川东学联组织学生查获德和恒、天锡生、天锡福、源吉庆等商号大批日货，分别运至夫子池、打枪坝焚毁。次日召开商学联合会议，发生斗殴。商学双方代表各有人受伤，事态扩大，各执一词，全市学校罢课，部分商人罢市。附近各县学校纷纷支持重庆学生，有的罢课，有的赶来重庆声援。后在各方人士调停下，举行“商学仲裁会议”，达成协议：四家商号罚款8000元，查实不是日货的发还销售；分别慰问双方受伤者，由商学联合会垫付学生受伤者医药费，官厅究办伤害学生肇事者，并议定了会后抵制日货处置办法。至6月初商学冲突乃告结束。

6月

川东学联总结商学冲突的经验教训，认为查禁仇货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民众知识浅陋，国家观念淡漠；只抵制仇货而未提倡国货，所以虽禁不止。他们提出新的工作方针，强调：实行乡村讲演，以振作民气；推广平民教育；提倡实业，提倡国货；改革风俗脱离旧有恶习；传播文化，建立书报社，组织出版物。

经商学联合会评议会商定，在对销售日货商人罚款余额中，拨出专款分别作为发展平民教育基金和建立国货贩卖部及调查国货生产情况。

7月至8月

利用暑假期间，东川道属教育研究会于7月25日开始，川东各县百余人参加。与此同时，举办学术讲演会，自由旁听。两个会均由从北京聘请的知名学者高一涵、陈启修、陶孟和等主讲。同时受聘来渝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黄日葵（二人均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亦到暑假学术讲演会讲演，他们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情况，并针对重庆青年身受封建势力严重束缚的现实，演讲了男女平等、社交公开、教育革新等问题，宣传进步思想，提倡革新精神，深受与会者欢迎。讲演会历时一月余，在重庆青年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暑期讲演会结束后，邓中夏支持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择师运动，至10月离渝。

10月21日

恽代英自武汉到重庆，将赴泸州主持川南师范教务。在渝期间，应邀到重庆联中和川东师范讲演，猛烈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军阀政府，指出国家和社会的希望在青年，要靠青年争取未来，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1922年

1月29日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陈毅（1920年由成都留法预

备学校赴法)等由上海到达重庆。

2月3日,发表《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返归国后宣言书》,陈述留法爱国学生因反对北洋军阀以川、滇、粤、桂四省采矿建路权及全国印花税为抵押名,向法国秘密借款的卖国罪行,因而横遭中法官方通同迫害的事实,呼吁各界追究政府,支持爱国学生。此后,陈毅等往返成渝,交涉请愿,均无结果。其间,陈毅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受聘到《新蜀报》任主笔,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和文艺作品。终因触犯地方军阀,于1923年9月中旬被“礼送”出川。

4月至6月

重庆学界争取全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进入高潮。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刘湘被迫应允将全省肉厘(屠宰税)拨作教育经费,不得侵占,并于4月1日开始实行。当日,全市各校师生举行庆祝游行。因驻防成都的川军三军军长刘成勋等仍拒不实行,并唆使暴徒打伤学生,重庆学界再次奋起。6月10日、22日,川东学联组织各校连续举行罢课游行,声援成都学生的斗争。重庆全省教育改进会,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商学联合会等亦积极参加,川东学联与之会同派代表分三路向成都行进,沿途宣传,重庆防区驻军川军一军军长但懋辛等表示,凡属防区内之教育经费,防军不加干预。重庆地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取得成功。

9月21日

重庆联中因挽留被省长公署撤换的进步校长熊俊发生学

潮。反动当局开除进步学生，受熊聘请来重庆任教的共产党员肖楚女和联中教师唐伯焜等支持学生运动，相率离校。

11月，肖楚女、熊俊等创办重庆公学，专门接受重庆、成都、泸州等地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的学生，共有学生156人。肖楚女选用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作为教材，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由于反动当局日相逼迫，重庆公学于次年1月被迫解散。肖楚女短期到万县师范任教后于1923年6月回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兼在省二女师任教，并积极从事青年运动。至1924年1月离川到上海，在团中央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报》。

10月9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正式成立。这是重庆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

在此之前，由在上海入团的唐伯焜担任“临时书记”，联络从国外和外地返渝及新发展的团员共10人，经五次会议筹备，于当日选举产生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周钦岳（曾由上海赴法勤工俭学）任执委会书记，董宝琪为书记部候补干事，李光斗为经济部干事，唐伯焜候补，李守白为宣传部干事，李纬候补。根据当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和章程，制订了地方团纲领、章程和宣言。并报告团中央请求承认。团中央直到1924年1月才正式承认重庆地方团，但重庆地方团从成立起，一直坚持了组织活动，并向团中央报告工作。

10月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和重庆总工会（其书记李守白亦为团地委宣传部干事）根据团中央部署，响应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号召，发动民权运动，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大城市同时，在国庆日组织3000工人、学生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街散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和《致工界》的传单。《宣言》宣称“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一无产者国家。”《致工界》说：“现在最苦的要算是我们工人，我们再不用一种相当的手段，将种种丧失赎取回来，敢断言将来决无幸福可言。”

10月下旬，由地方团发起成立了重庆民权运动大同盟。要求用“严重的手腕，普遍的呼声”实现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普遍选举权，劳动保护法，男女平权，受教育权。

10月26日

团地委与工会、商会、学联、新闻记者团、民权运动大同盟、教育会、律师公会八团体负责人共同发起裁兵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各界到会5600余人。促进会旨在发动裁军运动，促进四川裁军。团地委负责人唐伯焜、董人宁被推举为促进会职员。

12月4日

为抗议英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云南片马，重庆工人、学生1000余人举行游行，并成立重庆工学联合会。次日，学生2000多人继续游行示威。

1923年

1月

恽代英（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下半年在泸州期间，受到地方当局迫害）带领泸州进步青年余泽鸿、张霁帆等10余人到重庆考查社会情况。在重庆活动一月余后转成都。恽代英对重庆地方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并向团中央反映，对唐伯焜的作风提出严厉批评，并认为重庆地方团的最大缺点是缺乏办法。

同月

童庸生（童鲁）在成都省高师毕业后回到重庆，在巴县国民师范任教。童是1922年10月15日成立的成都地方团执委会首任书记，不久因与指导者王右木意见不合，发生矛盾，退出成都地方团，并离开成都。到重庆后立即加入重庆地方团，并担任团地委领导职务。到1926年夏离开重庆之前，一直是重庆地区党团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5月1日

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总工会组织下，重庆工人80余帮2000多人集会游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工人们高举“劳工神圣”、“劳工万岁”的大旗，发表宣言，要求制定“工场法”、“劳动保险法”、“保护童工法”、实行“8小时工作制。”

5月4日和7日，重庆工学商界为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连续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提出“不食日本物品，不住日本房屋，不乘日本轮船，不受日本人雇用”四项誓约。

9月

工界各帮女工代表30余人开会筹建女工联合组织，并发表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女子“陷于奴隶之奴隶的惨状。”要求加强“工场卫生”，订立“女工保卫法”，实行“8小时劳动制。”

11月

童寓生代表重庆地方团在4日、8日、14日三次致信团中央，报告重庆情形和团组织活动情况。信中报告重庆地方团有团员23人；恳切要求团中央尽早承认重庆地方团，并给予工作指导。

同月

重庆纺织工人1000余人，在工会领导下（工会会长为重庆地方团团员何星辅），要求厂主增加工资，酿成工潮。

12月15日

杨森、邓锡侯、袁祖铭率军攻占重庆。

12月15日

得到吴佩孚支持的杨森、邓锡侯、袁祖铭率军攻占重

庆，广州政府系统的熊克武部退到永川、荣昌一带。数日后，刘湘、刘存原亦到重庆，与杨森等人联手。次年，熊克武兵败退出四川，经贵州、湘西等地撤往广东。熊克武的失败，使四川的国民党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1924年

1月12日

吴玉章、杨闇公、廖划平、傅双无等在成都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团”（Y·C团），与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实行政治联合，共同行动。不少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又是Y·C团成员。Y·C团出版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形成“赤心评论社”，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后，Y·C团成员在政治上分化，吴玉章、杨闇公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使全川的马克思主义力量统一起来，为四川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傅双无为代表的少数人，坚持无理要求，与党相对立，大革命失败后，傅双无等少数人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

Y·C团的许多成员到重庆活动，或与重庆有直接联系，对重庆有重大影响。

1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正式承认重庆地方团，发给文件，指导工作。从此，重庆地方团在团中央直接领导下，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团的组织也逐步发展，当月开始建

立了巴县中学和巴县国民师范两个基层支部。到5月，已发展团员34人，大多数为中等学校师生。

5月9日

重庆学联出面组织群众在打枪坝集会，举行追悼列宁大会。会后，地方团组织继续在学生群众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6月

杨闇公代表Y·C团，离开成都经重庆赴上海，与中共中央和团中央联系Y·C团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合并事宜未果。在沪期间，杨闇公与恽代英等人时有接触，深受其影响。

8月，杨闇公回到重庆。9月，杨闇公参加重庆地方团，并立即起了重要作用。

9月1日

团中央获悉潘学海以重庆、成都、泸州三个地方团组织名义与四川国民党组织缔约并接受其津贴，认为严重违反纪律，决定解散这三个地方团，委任于当年8月再次来渝仍任《新蜀报》主笔的肖楚女为特派员，授以其全权，负责清理整顿组织。

后来查明缔约系潘学海个人行为，与三个地方团组织无关。但肖楚女仍然帮助重庆地方团进行了整顿，他着重批评了团地委前主要领导人唐伯焜，团结了大多数，包括反对他，对他有很深误解的同志在内，并引导推动地方团参加实际斗争。这次整团以1925年1月团地委再度改组结束，杨闇公、童甯生等当选为主要领导人。由此重庆地方团摆脱了“研究小团体”状态，日益发挥了重要政治作用。此时，

团地委所辖除市内川东师范、省二女师、巴县师范、巴县中学、《新蜀报》等五个支部外，还在江北县、涪陵县、綦江县、巴县永兴场等地建立了四个支部。

9月21日

重庆团地委联合各进步团体共13个单位，发起筹建“重庆反帝国主义联盟”，发表《重庆反帝国主义联盟宣言》，呼吁“海内全体青年，一切团体，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所以得藉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粉碎他们的“武力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9月28日“重庆反帝国主义联盟”正式成立。

10月26日

重庆团地委发起组织团的外围组织“四川平民学社”。数月之内，社员发展很快，重庆设总社，成都、内江、江津、南川、泸州、宜宾、南充等地设分社。同时还组织了“学行励进会”等团体。这些进步群众组织在团地委领导下，在组织青年学生、工人、店员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培养后备力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1月19日

日本商轮“德阳丸”载运成色低劣的双角银毫到重庆，拒绝海关检查并打伤检查人员，酿成“德阳丸案”。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暴行和重庆官厅对日交涉的软弱态度，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慨。肖楚女和团地委积极投入并领导了这场反帝斗争。11月2日，重庆46个团体在巴县图书馆召开大会，

成立“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在肖楚女支持下，二女师提出，不经过各级官厅，由人民直接进行国民外交。12月8日，“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发表第二次宣言，提出六项强硬主张，要求当局接受，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休止”。13日，重庆各界群众7000多人，高举“外抗侵略，内肃官方”的旗帜，在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要求日本领事赔偿抚恤费，以及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的宣言、通电、抗议及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捣毁了省长公署。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迫使地方军阀政府不得不撤换了重庆海关监督，日本也被迫调回了驻重庆领事。

1925年

年初

根据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精神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年过25岁的团员“应酌量介绍其入党”；在有团组织而没有党组织的地方，由团中央向党中央负责，领导团组织“去为党发展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重庆团地委开始从团员中发展党员，杨闇公、童甯生等主要骨干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均留在团内工作。

根据团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此时，杨闇公以团地委组织部主任代理秘书（书记）。

1月18日

团地委联合四川国民党组织发动成立“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这是中共中央为支持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割据局面的主张而在全中国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的组成部份。重庆团地委积极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拥护这一主张。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选出童寯生、邓懋修等6人，綦江县国民会议促成会选出邹进贤、霍步青等4人为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到北京后合称四川代表团）。2月27日，各界群众14000多人，在打枪坝召开欢送重庆赴京代表的大会。至5月底，童寯生等部份代表返渝，向各界报告大会情况。

2月

团地委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决定加强工人工作，设立工农教习训练委员会，在工人中建立支部。3月29日，在团地委领导下成立“劳工互助社”。该社由重庆的手工业和机械工业中的青年工人组成，成立时有会员100余人。

4月7日

重庆各界人民在总商会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会。追悼活动进行了一个星期。其间，团地委组织了50多个演讲队，印发了70余种传单，广泛宣传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在重庆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次悼念游行即达4万多人。

春

在地方军阀政府支持下，教育界的封建顽固势力和反动报刊对革命力量发起攻击，团地委和肖楚女、张闻天（1924年11月到二女师任教，此时尚未入党）等进行反击，在思想舆论领域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一些革命刊物应运而生。3月底，张闻天指导川东师范进步学生创办了《南鸿》周刊；5月初，团地委以平民学社名义创办了《曙光》周刊。肖楚女、张闻天等均著文宣传阶级斗争，抨击黑暗势力，支持革命运动。以上活动引起反动势力的忌恨，到5月中旬，重庆卫戍司令部下令查封《南鸿》和《曙光》，并勒令肖楚女、张闻天、廖划平限期出境。

5月

团地委组织的“中山主义青年社”成立，有成员80余人。这是根据党、团中央指示，为加强国共合作所进行的一项工作。鉴于当时四川国民党组织（中心在重庆）中右派势力庞大，排斥左派力量，团地委采取多种方式组织青年，扩大左派力量。双方都在为下一步在四川正式实现国共合作作各自的准备。

6月2日

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来重庆，各界人民群情激奋，再一次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浪潮。

6月4日，劳工互助社、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联合各界37个团体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

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

6月7日，工、学、妇女等界84团体联合组成“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在此前后，各界、各团体分别成立了“大中华民国重庆工界外交急进会”、“重庆各机关、法团、学校、报社沪案后援会”、“重庆青年爱国团”、“重庆青年护国团”、“重庆雪耻团”等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广泛开展宣传；组织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发动市内英日洋行工人罢工，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查禁英日货物，不卖食品给英日侨民等）。并呼吁对英日强硬外交，要求收回海关，取消租界，撤除巡捕，取缔会审公廨，废除内河航行权。重庆航业公会所属11万多船帮工人宣布，宁愿牺牲营业，坚决对英日经济绝交，誓言：“有国无家，誓死不变”。英商隆茂洋行300多名猪鬃工人宣布辞工，高呼“愿做断头鬼，不为亡国人”。6月30日，各界响应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倡议，举行盛大集会，参加全国公祭“五卅”死难烈士的统一行动，实行全市罢工、罢课、罢市，以志哀悼。慑于全市人民的反抗怒潮，英领事馆开始撤退侨民，英轮船也被迫停航。

团地委根据中央通告，加强反帝运动中的组织工作。在国民外交后援会中成立团小组，积极领导运动的开展。同时成立组织训练委员会，加强对各团体的工作，争取他们倒向革命。通过这一场反帝斗争，发展了进步力量，在部分学校和青年中成立了“学行互进社”、“怒涛社”、“破浪社”、“六九赤社”和“青年改进社”等进步组织。

7月2日

国民外交后援会宣传队在南岸龙门浩英国隆茂洋行附近讲演，英国军舰上的水兵突然登岸，刺死我同胞4人，刺伤10余人，制造了“七二渝案”，激起了全市人民更大的仇恨。

7月3日，团民外交后援会组织群众集会并抬尸游行，愤怒抗议英帝国主义新的暴行。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镇压，打伤示威群众，捕去讲演的学生，并贴出布告禁止游行和沿街讲演，禁止英日企业的华人辞工，禁止宣传“过激主义”，等等。群众怒不可遏，撕掉全部布告，并于下午6点再度集会，赴各处请愿。

7月5日

北京、上海等地一批川籍学生到达重庆，报告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汉口杀害我同胞的情况。随后，成立“京、沪、汉沪汉案宣传代表重庆联合办事处”，并推动重庆各后援团体成立“重庆各界外交后援会联席会”。

7月15日

杨闇公、童甯生代表团地委写信给团中央，要求在重庆“成立C·P”。

8月15日

吴玉章受国民党中央委派，以四川党务筹备员名义到重庆，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

经过吴玉章的努力，改组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

会，吴玉章任组织部长。在吴玉章的指导和支持下，左派力量在重庆和四川各地迅速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成为各级党部的主要骨干，从而推动了四川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0月，选出吴玉章、杨闇公、邓懋修、童膺生、廖划平、黄复生、廖竹筠（廖苏华）7人（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占6人）为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

9月4日

在吴玉章、杨闇公的积极筹备下，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在大溪沟“懋园”开学。由吴玉章任校长，教职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第一批招收学生300多人。这是党为培养革命力量在四川开办的一所学校，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革命骨干。

9月13日

重庆团地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共36人出席。会议讨论了半年来的工作情况，并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书记杨闇公，组织部主任曾净吾，宣传部主任童膺生，学生部主任张锡畴，农工部主任陈秉渊（程秉渊、程子健），妇女部主任王履冰。候补委员三人：龚鹤、沈宗元、廖竹筠。

9月下旬

团地委改选后，着手整顿外围组织平民学社，劳工互助社及妇女改进会，使之成为共青团联系青年知识份子、工人、妇女的坚强团体。9月23日，团地委致信团中央，再次

要求批准成立重庆党组织，以便团组织专力进行青年工作。

10月

二女师“驱黄运动”进入高潮。因省教育厅撤换进步校长蒙才成，另委反动迂腐的黄尚毅长校，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同时，重庆联中亦掀起学潮，驱逐迫害学生的校长舒启元。团地委因势利导，通过川东学联出面领导这两次学潮。经过“驱黄”、“驱舒”斗争，并取得胜利，打击了依附军阀当局维护封建文化的诚学会。

10月10日

团地委为扩大宣传，反击军阀当局、国民党右派和诚学会的压迫，发起国庆纪念日反帝示威大游行，以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各界群众万余人参加，沿街呼喊口号，散发传单达百余种八九万份。卫戍司令王陵基先以布告禁止，继之派兵阻拦，均未得逞。在诚学会和国民党右派的唆使下，当晚即下令通缉吴玉章、杨闇公、童甯生三人。同日晚，国民党右派闯入左派掌握的光国学校，对团员赖吾辛（赖元良）殴打行凶。

11月1日

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杨闇公、童甯生、邓懋修、廖竹筠（廖苏华）等四人同日起程赴穗。另三名代表吴玉章、黄复生、廖划平已先期到穗。吴玉章并任大会秘书长，负责会议筹备和会议期间常务工作。

四川国民党在吴玉章领导和各地共青团组织的积极参与下，近几个月来，左派力量迅速发展，到10月中旬，在四川各地已建立国民党区分部441个，党员达8000余人，在此基础上选出的国民党二十大代表7人中，左派占绝大多数。

11月7日、8日

美国商轮“美仁号”在长寿和重庆附近江面横冲直撞，并开枪射击沿途抗议群众，先后浪沉木船四只，淹死53人（内有川军官兵24人），打死1人，伤9人，酿成“美仁轮事件”。

9日，群众将伤亡人员抬到美柯克士洋行，要求抵命赔偿。美国领事被迫承认收敛死者，医治伤员。待伤亡人员搬出后，美国领事却全盘否认，并反诬一口，公然提出抗议。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立即发表宣言，强烈抗议美帝暴行，并出版《美仁轮案专号》，揭露事实真相，派出代表团赴京向外交部交涉“美仁轮案”以及“七二渝案”问题，提出六项解决条件。重庆海关在群众压力下，扣留美仁轮。而北洋军阀政府却下令放行。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和川东学联再次组织愤怒的群众举行抗议示威游行。运动先后持续一个多月。在军阀政府卖国政策统治下，此案不了了之。但在人民群众的反帝怒潮下，美仁轮从此不敢再行驶川江。

11月28日

国民党右派执委张赤父、朱叔痴等趁吴玉章、杨闇公未在渝之机，召开省、市党部联席会议，强行通过将省党部迁往成都的决定，企图将省党部置于右派控制之下。由于在省党部秘书处工作的共产党员坚决抵制，此阴谋未能得逞。右

派又纠集人员于12月10日闯入省党部，强行抢走印章和文件去成都。右派的破坏行为，引起各地的不满，许多县党部、区分部纷纷通电反对迁省，并否认上海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伪中央。次年1月1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复电否认右派的决定，并下令停止四川省执委会职权。

下半年

一些四川籍的共产党员陆续从国外和外地回川，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他们中许多人如冉钧、周贡植、杨伯凯等在重庆活动，参加了团组织的工作。

1 9 2 6 年

年初

根据党团中央指示，重庆党支部成立，冉钧（留法归国）任书记。

与此同时，綦江党支部于1月24日成立，宜宾党支部于1月30日成立。

此前，1923年下半年，王右木在成都曾建立党的独立小组。1924年上半年，因军阀的压迫和王右木牺牲，独立小组解体。

此次四川各地党组织的相继建立，随即进行了党的发展。

2月底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

本年1月，杨闇公、童寅生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2月下旬，杨闇公、童寅生回到重庆，正式建立地委。地委书记杨闇公、宣传吴玉章（因吴玉章留国民党中央工作，改为钟梦侠负责），组织冉钧，候补执委李嘉仲、程秉渊。地委成立时，重庆一地原有党员19人，从团员转为党员22人。地委成立后，綦江、宜宾以及陆续建立的省内各地党组织均由重庆地委领导，重庆地委实际是全川党的领导机构。以后，地委增设工委，程秉渊任书记，学委，杨伯凯任书记，妇委，程志筠任书记。

同时，重庆团地委改组。书记由团中央指定童寅生担任，宣传刘成辉，组织张锡畴，经济（委员会）刘远期，妇女缪云淑，学生部郑鼎勋。团地委又成立教育委员会，书记刘成辉，委员有李嘉仲、冉钧、杨伯凯、罗振声、肖华清。3月，在童寅生代表党团重庆地委巡视四川各地时，书记由刘成辉代理。重庆团地委亦是全川各地团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

同月

国民党中央决定解散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另委李筱亭、杨闇公、邓劼刚、陈宣三、张克勤（杨、陈、张三人是共产党员，李、邓二人后亦加入中共）及原执委中的邓懋修、郭云楼、唐德安8人组成新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莲花池（习惯称为“莲花池省党部”）。

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的伪中央，此时亦派人回到重庆，于3月1日另成立“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办

公地点设在总土地（习惯称为“总土地省党部”）。右派省党部成立之后，勾结军阀、团阀，搜罗流氓打手，欺骗落后青年，大肆进行反共宣传，不断与左派省党部制造磨擦，挑起事端，气焰十分嚣张，两方斗争甚为激烈。

2月至4月

重庆猪鬃、木工、印刷工人连续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老板和把头压迫。这些斗争均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推动了重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3月

18日，北洋军阀政府执政段祺瑞下令向反对英、日等八国通牒的北京各界请愿代表开枪，当场死伤100余人。惨案发生后，全国学联急电重庆外交后援团体联席会，通报惨案真象，呼吁援助。重庆各界团体成立“北京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并纷纷发出通电声讨军阀政府罪行。川东学联通电提出“请国民政府及全国军人北伐讨段”，“断绝与北方政府的一切关系”，“组织全民需要的统一的国民政府”。

同月

根据中共重庆地委的决定，从巴县、江津、綦江、宜宾、合江、南充等地选派牛大鸣等25人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此前后，地委还派遣刘远翔去自贡开展工人运动；郭经阶、张翰君（陈同生）等去营山开展农民运动；输送了一批党、团员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

4月1日

各界妇女代表300余人，在巴县图书馆召开“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次日，妇联合会发出成立宣言，表示“努力于中国之民族解放工作”。26日，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出师北伐。5月2日，召开追悼北京“三·一八”死难女烈士大会，会上沉痛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妇女的罪行。并发出宣言和快邮代电，呼吁“各界妇女联合起来！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团结着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号召妇女界献身革命，为自由解放而斗争。

4月8日

重庆学生联合会成立。团地委组织部长川东师范学校学生张锡畴为总务部主任，学委书记、中法学校学生郑鼎勋为组织部主任。

4月上旬

重庆党、团地委共同召开批评会，出席者有杨闇公、童瀚生、杨伯凯、冉钧、程子健、李嘉仲、刘成辉、张锡畴、喻凌祥、吴鸿逊10人，其中多数为党、团地委负责人。批评会根据中央的指示，解决童瀚生、杨伯凯（杨洵、杨道融）之间的矛盾和误会。杨伯凯自1925年下半年从法国回国，经党、团中央介绍到重庆，在团地委领导下，协助吴玉章筹办中法学校。在工作过程中，杨伯凯与童瀚生等发生意见分歧。杨主张多“研究主义”，在此基础上发展组织，开展斗争，童

等主张在实际斗争中加强学习，壮大组织；杨强调集中力量办好中法学校，不欲多作其他社会工作，童等主张每个党团员应完成“团体”（党团组织）分配的各项工_作。分歧中也包含了一些个人意气之争，影响了工作，影响了团结。批评会上开展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会主持人杨闇公在总结时强调：“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拥护团体的统一”。

4月11日

“綦江米案”爆发。綦江连续两年发生旱灾，米价腾贵，而地主奸商勾结军阀，大量囤积居奇，把米贩运贵州，牟取暴利，更加重了灾情，饥民死者无数。中共綦江支部在东溪组织饥民阻止粮食外运，并将待运大米扣留，分给饥民。军阀和豪绅随即派兵镇压，枪杀饥民3人，逮捕党员和积极分子3人。后经重庆地委组织声援营救，被捕人员得以释放。这场斗争锻炼了群众，使綦江成为当时四川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县份之一。

4月25日

重庆学生和工人讲演队在街头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突遭国民党右派分子组织的流氓分子毒打。川东学联和市学联负责人张锡畴等4人被打成重伤，酿成“4·25凶殴案”。地委发动社会各团体开展猛烈抗议斗争，右派头领被逼认错道歉，右派处境狼狈。

5月23日

刘湘军队联合杨森部进占重庆，将长期驻重庆的袁祖铭

黔军赶走。随后，刘湘将川康边防督办、四川善后督办两署从成都迁到重庆，刘湘的势力从此独占重庆。

6月

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革命力量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国家主义派以重庆及四川为基地，自1925年下半年以来，依靠军阀当局，积极反共，并向革命势力挑起争端。6月1日，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发起在打枪坝召开“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群众万人以上。次日，《新蜀报》在报导大会盛况的消息中，对被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二女师和联中未能参加表示遗憾，两校国家主义派骨干分子竟带领一些学生冲入《新蜀报》社，将总编辑周钦岳扭出游街，进行人身侮辱。事后，重庆地委动员各方舆论和各界群众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卑劣行径。新闻界立即成立“新闻界雪耻后援会”，全川报界纷纷响应。这一斗争历时一月，最后两校教务主任被撤职，两校校长公开登报道歉，不久被迫离校。国家主义派一时在群众中声名狼藉。

同月

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县指导筹建左派县党部。在中共党员的参加和推动下，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发展，很快在几十个县建立了左派党部。在左派党部领导下，各地的工运、农运、青运、妇运都有进一步发展。

7月

中共重庆地委为响应北伐军顺利进军，将工作中心转到发动群众支援北伐，策动川军倒向国民革命军方面。3日，重庆地委向党中央送出《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及《四川军队调

查表》的报告。9日，莲花池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情况报告，并建议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应即统一川滇黔，以巩固后方。23日，中共中央发出《致重庆信》，指出，四川军人倒向国民政府，²虽是投机革命，但可以分裂军阀的势力，不应拒绝。指示地委，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派人进入军队去作政治宣传。同时提出“希望川军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

在此前后，地委派吴玉章、刘伯承、童寓生等做川军中有进步倾向将领的工作，并派人到川军中作政治工作。同时，党中央派朱德到万县作杨森的工作（8月11日到万县，后由国民政府任命为杨森的20军党代表）。中共北方区委派陈毅回川，由重庆地委安排从事军运，后到合川陈书农部政治部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川军中一批中层将领倾向革命，其中有的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8月13日

四川军阀首领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见北伐军声势浩大，遂投机革命，联名发出通电，讨伐吴佩孚，宣布北洋政府一切措施无效。

但军阀们首鼠两端，表里不一。到9月下旬，他们见北伐军节节胜利，才表示服从国民政府，愿出兵东下。刘湘、刘文辉、刘成勋、邓锡侯、田頌尧打出川康北伐联军旗号，以杨森为前敌总司令，但实际却按兵不动。杨森在其他军阀之前已与国民政府接洽，暗中却仍与吴佩孚勾结，10月竟出兵进犯已为北伐军攻克之武汉，遭惨败后，才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随后，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

辉、邓锡侯、田頌尧等分别就任国民政府委任之军长职。同时，蒋介石又给三刘一赖另行加委，并任命刘湘为“川康绥抚委员会”主任，相互进行勾结。

9月5日

万县惨案发生。

8月29日英国“万通”号商轮在云阳附近浪沉木船，造成中国军民死亡及财产损失，杨森下令扣留英轮“万通”号。9月5日，英国军舰“威警”号、“柯克捷夫”号和“嘉禾”号企图劫走该轮并蓄意屠杀，炮击万县县城，打死我同胞604人，伤398人，毁民房千余间，财产损失近千万元，造成“万县惨案”。在万县杨森部工作的朱德、陈毅立即发起抗英斗争，并派人向重庆地委汇报。地委立即发出指示。8日，党左派省党部发动各界300多团体组成“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发起了抗议、后援和与英经济绝交等活动。18日，雪耻会发动全市400余团体、5万余群众举行水陆两路示威大游行，开展全市罢工、罢课、罢市活动，抗议英帝暴行。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在全国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怒潮。通过声援万县惨案，进一步发展了重庆人民积极支援北伐战争的活动。

9月10日

童膺生受重庆地委委派，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四川政治军事形势，认为朱德、刘伯承可能形成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央根据童的汇报，作出8条结论，指示重庆地委，应利用四川军阀投向国民政府的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指出在四川

有发展自己武力之可能。

9月23日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军阀不容存在于今之世”，“使军队武力建筑于人民利益之上，由武力与人民相结合，更进而使武力民众化，换言之，其武力为人民之武力，其军队则为人民之军队”。号召民众“努力各阶级的严密组织及训练，扩大联合战线”，“督促四川觉悟军人与国民革命军联合奠定全川”。

9月28、29日

为了策动川军北伐，筹备起义事宜，杨闇公以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名义，在莲花池召集川军中左倾将领12部份的代表开会，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接着又秘密召集计划起义各部，布置在其驻地顺庆（南充）、泸州、合川举行起义。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分任一、二、三、四、五路司令。会后命令各部在驻地积极准备，待命行动。

10月

中旬，经吴玉章提议，国民党中央任命刘伯承（本年5月，在重庆已经杨闇公介绍加入中共）为负责四川军事工作的中央特派员。在这以前，7月，刘伯承已由广州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政府四川军事特派员。刘伯承奔走于川粤之间及四川各地，策动川军响应北伐。此时，为加紧起义准备工作，重庆地委先后派30多名党员到预定的起义部队和起义地区工

作。

11月

刘伯承于月初抵渝后，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军事委员会。军委书记杨闇公，委员朱德、刘伯承。随后，杨闇公、刘伯承到合川黄慕颜部具体安排起义事宜。预定，黄部开拔到顺庆（南充）与秦汉三、杜伯乾部会合，宣布起义；同时，袁品文、陈兰亭部在泸州起义，并到顺庆集中；共同北上消灭盘踞在绥定（达县）一带顽固投靠北洋政府的四川军阀刘存厚部，再出陕西，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合。以此行动打破四川军阀首领们投机观望，佯称依附革命而实际按兵不动的局面。同时在起义中发展中共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

11月21日

由党领导的（通过国民党左派省党部）“重庆市总工会”成立。在此以前，经过斗争，争取了工人的多数，拆散了右派控制的总工会。重庆市总工会直接向武汉国民政府立案，得全国总工会承认，声威壮大，总工会成立后，团结了工人的大多数，并注意加强女工工作。总工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中共党员占多数。

11月25日至12月4日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忠烈祠（中山中学）召开，到会有27个县、市党部和特别区党部、妇女的代表共6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三分之一，其余均是国民党左派。会议的主要目的和议题是：坚持新三民主义，发

展左派力量，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进一步发动民众支援北伐战争，深入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会上，杨闇公作政治报告、工运报告和农运报告，刘伯承作军事报告，程志筠作妇运报告，邓劫刚作商民运动报告，李筱亭、邓劫刚合作党务报告，张克勤作省党部财务报告，各县市代表分别作各自的党务报告。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及惩办右派党部反动分子和加强对国家主义派斗争等议案。会议选举李筱亭、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9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刘愿庵、廖刘平、陈宣三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李嘉仲等5人为监察委员，熊晓岩等3人为候补监察委员（22名执监委中有10名共产党员）。

12月

1日，泸州驻军赖心辉部陈兰亭、袁品文旅发动起义，打出国民革命军四川第四、第五路旗号。3日，顺庆（南充）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旅起义。5日，刘伯承自重庆赶赴合川，与黄慕颜率部（川军邓锡侯部），开往顺庆。9日，起义军在顺庆（南充）召开誓师大会，刘伯承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分别就任一、二、三路司令。起义后不久，顺庆（南充）即遭军阀部队围攻，又因泸州起义部队未来顺庆会合，起义部队被迫退至开江。刘伯承在万县与杨闇公、朱德商量后，于1927年1月赶往形势紧张的泸州，在泸州成立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部。起义期间，吴玉章在湖北同杨闇公保持密切联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并促使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要刘湘等停止进攻起义部队。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刘湘等军阀肆无忌惮，再

次围攻泸州。在吴玉章的一再催促下，武汉国民政府授与起义部队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的番号，以刘伯承为军长。起义军坚守泸州半年，到1927年5月，因一些起义将领动摇，意欲投敌，刘伯承遂于5月16日撤离泸州，辗转到达武汉，随即接受党中央之命赴江西参加南昌暴动的准备工作。泸顺起义失败以后，泸州部队为军阀收编，开江部队一部分缩编为一个旅，东下鄂西，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泸顺起义是北伐战争期间，中共在四川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我党独立掌握军事力量的一次可贵的尝试。

12月24日、25日

重庆学生宣传队连续两天遭国民党右派暴徒殴打，激起公愤。各校学生齐集刘湘21军军部请愿，刘湘迫不得已下令解散右派省党部。但右派国民党分子有恃无恐，仍继续活动。

1927年

1月8日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重庆录取的男生270名，女生30名，乘船东下汉口。被录取的学生中有游曦、赵一曼（李坤泰）、罗瑞卿、徐彦刚、陈伯钧、张锡龙、胡兰畦等。随后，重庆地委又选派20名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2月15日

针对1月24日英帝国主义又一次在上海惨杀我同胞的罪行，重庆各界在中共地委和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下，成立“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

3月5日，反英大同盟在打枪坝组织数万民众联合抗英大会，杨闇公发表讲演。大会通过援助上海罢工工人、组织救济委员会、继续实行与英经济绝交等15项提案。会后举行了反英示威大游行。

年初

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在发动群众开展反帝斗争同时，注意发展革命力量，加强对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在重庆附近的巴县、綦江、涪陵、南川、长寿、江北等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綦江、涪陵、南川还建立由我党掌握的农民自卫军。重庆市总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3月3日省党部根据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2月16日决定，通令全省省县议会一律解散，限令一周内将财产交省县党部接收。同时通电否认一些反动分子所组织的伪县党部。另一方面，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极力勾结蒋介石，并伙同右派等反动势力，大肆进行阴谋活动。蒋介石先后派杨引之、戴弁、曾扩情、向育仁等到重庆，促使刘湘公开反共，刘湘与之一拍即和。在刘湘支持下，巴县地主武装民团团团长申文英等与国民党右派头子石青阳勾结，公开在南岸组织“讨赤军”，勒索“讨赤费”。南川、长寿亦发生摧残革命力量的事件。国家主义派分子组织的“中国青年党”也在重庆成立四川省支部。革

命与反革命双方斗争激化。

3月31日

2万余群众在打枪坝集会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遭到军阀刘湘的大屠杀。

先是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地群众集会庆祝。一些反动分子煽动溃兵及地痞流氓乘北洋兵败混乱之机，抢劫烧杀。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阻挠北伐进军，调集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打死打伤2000余人。消息传来，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出面定于3月31日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同时重庆军阀首领刘湘及其部将王陵基、蓝文彬与蒋介石派来的杨引之、戴弁等密谋策划乘机镇压。中共重庆地委已获信息，为维护成议，抒张民气，决定集会照常举行。一面派童子军、工人纠察队和商团加强警戒；一面通知党团地委和左派省市党部领导成员均带头参加，准备牺牲。

当天上午11时许，大会甫宣布开始，预先化装混杂在群众中的刘湘21军所属之3师王陵基部和7师蓝文彬部士兵，以及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英所属民团团丁，即开枪挥刀舞棒进行屠杀，直至下午二时左右，当场打死137人，伤千余人。大会总主席团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漆南熏，左派将领陈达三当场牺牲。在现场屠杀同时，军阀、团阀、国民党右派集团和国家主义派分子又纠集地痞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市总工会、新四川日报社、中法学校、中山中学、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等革命活动阵地。

4月1日

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市总工会委员冉钧于打枪坝脱险后，继续联络同志进行活动。当天上午在七星岗蜈蚣嶺巷遭军阀便衣队枪杀。

晚，杨闇公召集部分党员干部会议，布置惨案后的应急措施，决定杨闇公立即赴武汉向中央汇报“3·31”惨案和重庆情况，并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由钟梦侠、刘成辉、任煜（任白戈）组成临时党团地委，坚持工作。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

4月4日

杨闇公离渝赴汉，在轮船上被捕。4月6日，在浮图关壮烈牺牲。

4月10日

钟梦侠召集临时党团地委会议，推举任煜（任白戈）为临时党团地委负责人，指定詹正圣协助工作。会后，钟梦侠、刘成辉等相率离渝赴汉。临时党团地委依靠留渝的党团员，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基本查清了“3·31”惨案中牺牲的党团员、左派国民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人数和情况；找到和联系了一些党团员；恢复了部分党团组织，并向中央写了报告。6月，任煜（任白戈）离开重庆前往涪陵，临时党团地委由詹正圣负责。

4月15日

杨道融、李嘉仲在武汉以四川省党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

汇报重庆“3·31”惨案情况。随后国民政府免除刘湘一切职务，并令杨森、邓锡侯、刘伯承等就近讨伐。但四川军阀已与蒋介石完全勾结。4月29日，刘湘和赖心辉、刘文辉、邓锡侯、刘成勋、田頌尧、杨森等联名发出通电，拥蒋反共，反对武汉国民政府。

6月24日

涪陵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1000多人，邻近的南川、綦江、长寿、巴县等地亦派有代表参加，正式成立县农协，决定进一步推进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这是“3·31”惨案后，重庆部分革命力量转移到涪陵，与当地革命力量汇合的成果。

涪陵是共产党员、老同盟会员、川军将领李蔚如的故乡。李蔚如根据重庆地委和军委指示，在涪陵大力发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掌握农民武装数千人。得以在“3·31”惨案后可与重庆军阀团阀相对峙。此时，涪陵已成为重庆附近革命力量集中的最后一个阵地。

7月3日，李蔚如为杨森部驻涪陵师长郭汝栋与刘湘合谋诱捕，押至重庆。4日壮烈牺牲于南坪黄桷埡。涪陵革命武装随之解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7—1937.7)

1927年

7月下旬

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钟梦侠等入川，到达重庆，筹建四川临时省委，清理恢复组织。随后刘拔云等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到重庆，与傅烈等会合。

8月12日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成立，傅烈任书记。临时省委连续发出通告，对“3·31”以后的四川党的情况作出估计，严厉批评涣散现象，强调加强组织纪律，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迅速恢复活动，规定各地党的组织系统按照“五大”的党章变更为县（市）委、区委、支部。

8月

经过清理恢复，重庆已有党员58人，建立了中共重庆区

委，负责人张××、唐××、牛正声（牛大鸣）。到9月，重庆区委改为重庆市委，由临时省委兼市委，重庆附近地区还有江津、合川两个县委和綦江、静观场、高店场、崇文场四个特支。

同月

继傅烈等人之后，团中央派彭兴道、蔡明钊等来重庆，建立了共青团四川省执行委员会，书记彭兴道，组织蔡明钊，宣传徐活萤。同时成立了团的重庆市委，李华海任书记，组织和宣传由蔡明钊、徐活萤兼任。团重庆市委成立后，首先在市内各学校中进行清理，恢复了川东师范、巴县国民师范、二女师、重庆联中、巴县中学、商业中学和江北中学7所学校的团支部。

9月上旬

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八七”会议精神，议定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利用军阀混战局面夺取武装，发展土地革命运动。会议对农民运动、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工作和国民党工作作出相应决议。随后，临时省委扩大委员人数，确定傅烈、刘披云、刘愿庵、程秉渊、周贡植为常委，傅烈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刘披云任组织兼青年部长，刘愿庵任宣传兼秘书长，程秉渊任工人部长，周贡植任农民部长，程仲苍任妇女部长。

10月15日

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政治任务与

策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以及中央对临时省委的批评与指示。会议完全接受中央决议，认为：“现在，中国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任务，已完全肩负在工农运动身上。”“只有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很坚决的与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直接斗争，而取得工农运动方面的胜利。”“必须民权革命的急剧的前进与高涨……直接无间断的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并将9月省委扩大会议“没收反动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土地分给耕种农民和无地农民”，改为“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武装农民”、“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等主张。改变加强组织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认为四川省（莲花池）党部表现左倾，反对南京和武汉政权之非法诚属进步现象。但“必须真能完全接受急进的土地革命政策，方可认为是革命的暂时同道者……或择优吸收为同志，不必留着他们为左派挡场面，以为左派团体有永远存在之必要。”

11月

省临委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曾君杰、委员程秉渊、陈翹、程明海、谭喆。职工运动委员会在重庆领导了肠业工人的罢工、大小木工会与老板工贼的斗争，木箱工人的经济斗争等运动。重庆工人运动已在恢复和开始发展。

1928年

1月

收到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上年）11月扩大会议决议案

后，临时省委立即召集紧急会议传达讨论，表示完全接受。针对四川军阀之间即将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局面，临时省委提出“用民众革命的战争反对军阀屠杀人民的混战”等口号，要求各地立刻开始组织暴动。

根据同时收到的中央17号通告，临时省委取消了省委各部，改设组织局，下分组织、宣传、军事、文书、会计、出版等科。决定重庆市委改为巴县县委，另外成立江北县委，任白戈为书记。（不久，根据中央在各级领导机构增加工人成份的决定，改任工人党员李秉奎为江北县委书记。）

2月10日至15日

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估计四川形势，认为“四川的环境，客观上已到了直接革命不容再缓的时候”。会议议决：“四川的党，应加紧组织领导工农贫民，于二三月间，开始在各地陆续举行春荒暴动，由零碎的游击式战争，发动广大群众汇合成一个大的暴动。”

会议选举产生正式省委，省委委员11人，候补委员5人，以傅烈、刘愿庵、张秀熟、刘亚雄、周贡植5人为常委，傅烈任书记。（后因刘亚雄赴成都处理“2·16”事件善后工作，补江北县委书记李秉奎为常委。）

2月15日至17日

共青团四川省第一次代表扩大会在重庆南岸鹿角场召开，重庆、成都、自贡、万县、宜宾、涪陵、南溪、邻水、江津的代表共19人参加。会议选举新的团省委，徐活黄为书

记。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刘愿庵出席会议。

3月初

根据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和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决议，省委制订《春荒暴动行动大纲》。《大纲》要求：于最近二三月春荒期内，必须尽量加紧各种斗争，爆发游击式的战争，爆发不论大小，不择时期，不计胜败的群众的武装暴动。”

“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暴’局面。”《大纲》根据四川的情况，提出“必要利用广大的流氓无产阶级，特别是正要失业的农村地痞”作暴动的先锋队。《大纲》认为：“应该极坚决的，不计成败的去执行这个暴动政策，因为即使失败，亦等于胜利。”

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暴动的指导思想脱离实际，春荒暴动没有在全川范围普遍发动起来。当年春夏根据《大纲》发动的几次暴动亦均告失败。

3月9日

巴县县委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开会，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和程明海、周玉书、黄中元、刘俊明、吴永初、徐君治、张冠常出席会议。会议尚未正式开始，即被警察发现，傅烈、周贡植等均被捕，牛大鸣因迟到乘机逃脱。被捕者中除张冠常被判处无期徒刑外，傅烈、周贡植等和事后被捕的汪荣共9位同志于4月3日壮烈牺牲于朝天门。

“三九”事变后，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省委书记由张秀熟代理，刘愿庵出巡川东，另补牛大鸣暂代省委董

委。指派喻克由任巴县县委书记（月底即遭逮捕，4月19日牺牲）。

4月

刘愿庵为出席党的“六大”赴上海，并向党中央汇报四川工作，要求中央从速派干部回川工作。5月底至7月10日，中央先后派戴鹏（白在崑）、李鸣珂、穆青（韦新）等人到达重庆。戴鹏、穆青参加省委常委，李鸣珂负责组织省军委机构。

9月24日

由李鸣珂指挥，省军委特务队长刘墨苏等三人具体执行，将蒋介石派到刘湘21军军部任政训部主任的反共头子戴弁击毙于轿内。重庆卫戍司令部立即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共产党。

10月1日

由于原团省委书记彭兴道和团省委委员廖时勉叛变告密，党团省委和巴县党团县委均遭到破坏。从10月1日夜开始，叛徒带领21军稽查队连续数日进行搜捕，先后逮捕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代理团省委书记蔡明钊、巴县县委书记王松樵、团县委书记池望秋等党团干部20多人。张秀熟在法庭上与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的营救和呼吁下，此案转往地方法院，张秀熟被判10年徒刑，抗战前夕获释。

10月10日

在党的影响和发动下，重庆百余团体代表在夫子池开会成立“重庆市民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并发表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外交悬案。反帝大同盟成立后，积极开展反帝斗争。次年7月，被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

年底，在江巴党组织领导下，重庆成立“反基督教大同盟”，并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散发标语传单，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罪行。

10月13日

刘愿庵出席“六大”后返渝，立即进行党团组织遭破坏后的清理恢复工作。数日后召集在渝的党团省委委员开会，采取组织省临时委员会主持党团省委工作和成立巴县临时县委等措施。

10月20日

省委常委穆青巡视川南后到达成都，与在蓉省委委员和川西特委会合召开紧急会议，因未获刘愿庵的消息，决定成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暂设在成都，穆青为书记。同时决定撤销川西特委，在重庆成立川东特委。紧急会议之后，临时省委委员方策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四川情况，穆青、程秉渊到潼南双江镇召开会议，研究四川各军阀同盟军联合侧刘湘战争即将爆发之际的军运等问题。

11月底

刘愿庵由重庆抵达成都，向成都临时省委传达“六大”

精神和各项决议，12月18日，临时省委改组，推举穆青、刘愿庵、程秉渊为常委，穆青任书记。

10月下旬

川东特委在重庆成立。特委书记项鼎（苏爱吾），组织贺守朴，宣传兼团特委书记方明（苟永芳），军委书记李鸣珂，秘书长梁佐华。特委领导川东各县党的组织。1929年初在重庆地区设立了江巴县委，负责人为陈泽镛等。

1929年

春

《新社会日报》在重庆创刊，罗承烈任社长，川东特委书记项鼎负责主编，李鸣珂等为编辑。该报猛烈地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种种罪行和劣迹，并联合各报向国家主义派展开斗争，深受群众欢迎，发行量为全市各报之冠。5月1日，四川省政府奉国民党中央命令查封《新社会日报》，该报仍坚持斗争，复刊发行，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团体的积极支持。

6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再次电令查封，该报被迫停刊。为此，重庆报界协会和各进步团体发起请愿，声援《新社会日报》，并成立了“民众力争言论自由大同盟”。

川东特委领导的由地下党员任经理和店员的“九七书店”开业，发行进步书刊。此外，地下党组织还开设了“掘新书店”及“协合寄宿舍”、“南来燕咖啡店”等作为活动据点。

3月

由共产党员江涛等人领导，成立潼南赤卫队。赤卫队打土豪，分财物，与敌人周旋于潼南、合川等地，坚持到1932年失败。

4月27日

在王维舟、唐伯庄、李家俊等的发动和领导下，活动于万源、城口一带的农民自卫军集中于万源固军坝宣布起义，成立川东游击军。由李家俊任总指挥，雷玉书任副总指挥，唐伯庄任政委，随后在城（口）达（县）宣（汉）万（源）边境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多次抗击了敌人的围剿。在党内，成立城达宣万工委实行领导。

1930年1月下旬，四川省委正式命名起义军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游击根据地发展到1500余平方公里，人口数万，部队扩充至2000余人。1930年4月，敌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连续派重兵围剿，至7月起义失败，起义领导人李家俊到重庆参加省委和江巴中心县委领导工作。这是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次武装起义。

4月

重庆高中创立并开学。这是在川东特委领导下，由共产党员梁靖超（梁伯隆）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由刘湘自任校长，梁靖超任副校长实际负责。学校采用大革命时黄埔军校的教学方针。公开讲授和组织学习《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通俗资本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

ABC》等书籍。全校教师中有党员10多人，学生中有团员30多人，是党组织活动和培养干部的重要据点。暑假前刘湘借口“经费无着”，停办重庆高中，师生立即成立护校委员会，开展护校斗争。以后达成妥协，另办西南学院。西南学院开办不到一学期，又遭受迫害，被迫停办。梁靖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于年底迁往成都，再办西南大学。次年6月15日在成都被查封，校长和教授10余人、学生60余人被捕。10月，校务委员会主任梁靖超、教务长张竞若英勇就义。

6月2日

在党组织的发动下，重庆各界团体利用军阀与团阀的矛盾，在夫子池召开巴县“反团阀大同盟”。大会发表成立宣言，提出：“被巴县团阀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英、邹汉卿、傅汝闲、谢照临、杨济棠，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巴县”的主张。并组织宣传队讲演，派代表到21军军部请愿，还到各乡散发传单，揭露团阀罪状。随后巴县团阀武装为军阀武装所摧毁。

同月，继重庆联中学生开展驱逐国家主义分子的校长，迫使其辞职的斗争取得胜利后，重庆高中和联中学生又共同发起，联络全市中等学校正式成立了“反对国家主义大同盟”，积极开展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6月7日至11日

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接受“六大”精神，认为四川的政治总路线是在革命高潮到来之

前，艰苦耐心地加紧领导日常斗争，争取绝大多数工农兵劳苦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会议正式选举了四川省委，省委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各9人，其中刘愿庵、穆清、刘披云、李鸣珂、陈惠5人为常委，程秉渊、项鼎为候补常委；刘愿庵为省委书记，穆清为候补书记、组织部主任，刘披云为宣传部主任，李鸣珂为军委书记，陈惠为工委书记。会议决定省委迁回重庆，派李鸣珂为川东特委书记，先行回渝，进行省委迁渝的准备工作。

在此之前，江巴县委改为重庆区委，由川东特委兼重庆区委。

6月29日

川军邓锡侯部第28军第7混成旅旷继勋部全旅官兵2000多人在遂（宁）蓬（溪）边界举行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邹进贤任党的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为此发出《为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兵士举行革命兵变宣言》。四川省委指示川东特委就近指导起义部队，但未实现。起义部队经蓬溪、西充、南部、营山、巴中、渠县、达县等地，准备前往湘鄂西与红三军会合，在梁山境内被敌人包围，遭到失败。这次起义历时一个月，行程千途里，穿越12县，沿途镇压土豪劣绅，建立了两个苏维埃政权，对四川反动军阀造成极大震动。7月，江巴党组织在巴县各场镇贴出“快邮代电”，号召群众响应起义；贴出“四川红军是民众的真正武力！”“成立苏维埃！”“打倒一切反动军阀！”等30余种标语。

8月20日

省委由成都迁回重庆，开始正式办公。同时撤销川东特委，重庆区委由省委兼任。

省委迁渝后，特别注重重庆的工人工作，在渡船、服装、制鞋等行业组织赤色工会，并派人打入铜元局兵工厂、丝厂等处开展工作。

9月

四川省军委指示江巴兵委健全自身组织和整顿下属支部，设法扩大党在军阀部队中的政治影响，建立与健全党的中心工作。省军委指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是“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江巴兵委是由省军委直接领导，为统一开展重庆的士兵和警士运动而成立的一级党组织。

秋初

共青团江巴县委成立，由余治平（余国桢）担任书记。成立会上，方明代表上级组织出席指导。

秋

根据中央发动赤色群众向敌人示威，显示革命力量的指示精神，由省军委书记李鸣珂，江巴县委书记陈泽镗等组成“飞行集会”领导小组，领导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连续在会仙桥、都邮街、巴县中学农科等处举行飞行集会，并以中共江巴县委名义印发传单、标语。

11月4日

“重庆学生联合会”在大溪沟甲种工业高中开会成立。为加强对学运的领导，团江巴县委成立学运小组，领导重大、巴师、川师、艺专等校发起成立重庆学联。成立会上发表宣言，提出：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本家和封建教育家；要求政治、经济、教育一律平等，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重庆学联仅存在一个多月时间，即被21军命令停止活动。

11月中旬至20日

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全委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自6月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的工作，认为目前党的政治总路线仍然是加紧争取广大群众和准备武装暴动。会议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重申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确定的组织路线，并强调发展产业支部，努力于干部工人化，彻底改造党的基础；加强中心区域工作，在省内重要地方建立特区委和中心县委。

根据此次会议决定，重庆成立江巴中心县委（亦称重庆中心区委），由省委自兼。

12月

第二次全委会议之后，省委以全力开展重庆的工作，建立健全区委和支部组织。将省委兼辖的区委一划为三，即城区、江北区、南岸区三个区委；省委负责人直接下到各个支部帮助其开展工作。此时重庆市的党员有200余人，其中工

人占50%左右。

1930年

1月至3月

重庆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空前活跃。农历正月初二，铜元局兵工厂白药厂工人因反对厂方强迫年关上工而举行罢工，以后发展为反对厂方关厂的斗争。2月，油漆工人为营救被捕的工人领袖，两次包围地方法院，并沿街示威呼喊：“打倒清共大同盟”等口号。3月，铁机织布工人摆脱黄色工会，于24日成立铁机工人联合会，建立了党团，并通过赤色工会纲领。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其它行业的工人斗争先后有10多次。

春

刘湘为了加强反共，着手建立特务组织——21军特务委员会，并制定“反共自首”政策，收买叛徒扩大特务队伍。随后又在其防区各县成立清共委员会。这种反动措施威胁引诱了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下水，对党组织造成长期的严重危害。党组织曾组织“特务队”，以罗南辉等为队长，对怙恶不悛的叛徒特务实行镇压。以后又派余鸿文等打入特委会侦缉队，从内部掌握敌情，并将一些不甘心附敌的分子分化出来，组成“良心会”，接受党的指示进行活动。这些措施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上减少了特委会对党组织造成的危害。

3、4、5月

省委和重庆地区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一批重要干

部被捕和牺牲。

3月20日，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穆清（吕维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5月牺牲。

4月初，省兵委委员龚作新被捕；不久，江巴兵委机关及党领导的警士联合会被破坏，党在重庆的地下机关和活动据点“九七书店”、“掘新书店”、“协合寄宿舍”、“南来燕咖啡店”被查封，一批干部和党员被捕。

4月7日，中城区委书记陈泽镗被捕。

4月18日，省委常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率军委交通邓文书在朝天门路遇叛徒易觉先，易觉先刚带领数十名特务破坏了江北特支和逮捕了特支书记刘森元，双方即展开激烈枪战，在打倒易觉先与数名特务后，李鸣珂二人弹尽被捕，第二天，李鸣珂和江巴兵委书记张小灵、邓文书、龚作新英勇就义。

5月5日，省委负责人在浩池街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开会，由于叛徒告密，被警察包围，除代理组织部主任游少彬（邵宾）经搏斗跳窗脱险外，省委书记刘愿庵，常委、工委书记程俊生，秘书长邹进贤力竭被捕，5月8日壮烈牺牲。

经过刘湘白色恐怖政策摧残的重庆党组织党员人数减少。到6月，由省委兼任的江巴中心县委所属党员有117人，其中产业工人9人，手工业工人50人，农民17人，知识分子32人，其他成分9人。

4月7日

原准备参加涪陵兵变的队伍两排人开到罗云坝，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打出“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旗帜，

有人枪 300 多。省委曾派出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组织兵变，并任游击队总指挥（随即调回重庆，由赵启明接任，后又由省委派王岳生担任），前敌指挥赵启明，党代表、前委书记梁歌。

游击队在涪（陵）、石（柱）、丰（都）、彭（水）、武（隆）5 县边境建立游击区，武装发展到 700 多人枪，在 10 多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7 月，游击队在石柱受到军阀陈兰亭部围剿，遭到重大损失，游击队余部突围到丰都茶店子，决定人员分散，武器交丰都县委，部分干部转入三路红军游击队。

5月6日

刘愿庵等人被捕后，省委常委游少彬召集省委各部委秘书紧急会议，选举游少彬、罗世文（特生、澈木）、邹壁成（文甫）三人为常委，组成临时省委坚持工作。直至原省委委员程子健（秋霞、蜀才、小山）、项鼎（苏爱吾、裕华）赶到重庆后，于 6 月 10 日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省委，程子健、项鼎、游少彬为常委，省委分工：书记程子健，组织部主任游少彬，宣传部主任罗世文，工委书记项鼎，秘书长邹壁成。

在此之前的 4 月中旬，因江巴中城区委书记陈泽镗被捕，由马如龙接任书记。之后，省委将江北和南岸两区委缩小为特支，划归中城区委领导，又调贺静华为中城区委组织部主任，吴谊之为宣传部主任，赖之光任秘书长。

6月中旬

由中央指定任四川省委军委书记的余乃文（石夫）到达

重庆，参加省委常委。余乃文向省委传达中央的斗争路线和策略：以武汉为领导中心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要胜利。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组织红军。

7月27日至30日

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议，军委书记余乃文出席并传达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会议讨论了省委政治报告和军运报告，以及士兵暴动、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等问题。根据早些时候省军委会议的决定，计划将全川分为5个军区，组织17路红军，限各地3个月内先后发动，以配合全国红军集中进攻武汉。

7月29日

按照省委指示，党领导的梁山虎城、太平、龙沙三路农民武装开进到忠县黄钦坝、宣布成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李光华、副总指挥王维舟，政治部正副主任覃文、王炎离，前委书记牛大鸣。8月，游击队为配合攻打武汉向湘鄂西进军。过长江后在石柱被围受到重创，李光华被俘遇害，余部将枪支交当地党组织埋藏，部分武装分散回乡。三路游击队失败后，省委仍然十分重视该地区武装斗争，指示建立梁（山）达（县）中心县委进行统一领导。在原一路、三路游击队活动的川东北地区，先后有数支游击队坚持斗争，直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成立了红33军。

8月20日至9月1日

根据省军支联席会议的布置，合川连续发生地方暴动和

士兵暴动，均告失败。

合川（以及邻近的武胜、铜梁、大足、璧山）向为邓锡侯28军3师陈书农部驻防区。大革命时期，刘愿庵、陈毅等曾在该部发展政治工作。党在该部和合川地方均有一定基础，在城乡开展了罢工斗争和抗捐斗争。省委把合川作为武装暴动的重点，以便组织红军就近顺嘉陵江而下，夹击重庆。并建立5县（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行委和合川县行委实行领导。

8月20日，合川狮滩区区委组织300农会会员举起“四川红军第五路合武纵队合川支队狮滩大队”的红旗，分两路攻打团防武装和地主庄园，均未成功，被迫撤回。

8月23日，5县行委计划在驻扎云门镇的15混成旅第三团组织士兵暴动，因叛徒告密，团部将士兵武装全部收缴。暴动未成。

8月24日，组织合川城内分三处举行兵变。结果未成。

9月1日，在城内再次点火为号，举行兵变，因组织不严，联络不畅，亦归失败。

合川暴动的失败，先后20多人牺牲，70多人被捕。

省行委认为合川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5县行委和合川行委领导的右倾取消主义观念的导致，处分了两个行委的领导人。

8月28日至9月9日

中共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会议进一步贯彻“立三路线”，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武装暴动。会议选举了省行委成员，主席程子健，副主席兼工委书记冯吉熙，组织部主任程子健兼，

由饶耿之实际负责，宣传部主任罗世文，军委书记余乃文，青年部主任梁佐华，秘书长邹璧成。

重庆地区成立江巴市行委，由史伯康、曾海元负责。

会后，省行委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派党团员到军阀部队组织士兵暴动，建立红军；在农村积极发动米荒斗争，实行抢米，没收地主豪绅米粮及土地；组织游击队，扩大红军；在市镇多开书店，以转变学生思想。

9月3日

在省行委领导下，江津驻军兵变，甫起事即失败。

江津为刘文辉24军第一师及第二混成旅防区。副师长兼旅长张志和为共产党员，党在该部队及江津地方均有一定工作基础。因此同合川一样，为省行委当作就近夹击重庆，会师武汉的重点起义地区。省行委派行委委员项鼎为党代表，于渊（原20军旅长）为总指挥，计划起义成功后成立红军第五路，建立县苏维埃政权。

由于张志和认为条件不够，不同意起义，因此起义乘张志和到成都开会时发动。原订于9月5日起事，但以事机不密，消息泄漏，遂提前于9月3日发动，可敌人已作准备。傍晚时，机枪连首先乘收操之际，从野外攻打进城，一连、三连、六连起而响应。攻至县政府受阻。敌人又组织增援，切断几处起义部队的联系进行包围，起义部队腹背受敌。江津驻军27个连，参加起义的只4个连，同时主要领导人与起义部队失去联系，起义现场缺乏领导。地方党事先不知起义确切时间，无法有效支援。至次日黎明，起义部队撤出江津城，除一部分后来辗转到湘西投入贺龙红二军团外，大部失

散或为敌人搜捕，牺牲者达47人。

10月2日

铜梁县农民武装和县山防大队部分士兵共300多人在土桥举行暴动，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七路游击队”旗号，县行委的濮文昶（蒲华辅）、万平、雷汝维等参加领导。暴动队伍攻打乡公所，击毙反动团总，砸毁税卡，将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当天，即遭到敌人优势兵力围攻，暴动失败。

10月底11月初

重庆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叛徒宋毓萍、郝蜀筠、游曼谷等带领21军特委会便衣，日夜出没大街小巷，监视公众场所，先后逮捕了省行委工委宣传部秘书、江巴市行委秘书、江巴兵委委员及兵委所属的全部军支书记，破坏了江巴兵委机关。10月底，被判刑20年的原中城区区委书记陈泽镗，因在狱中组织暴动，被敌人杀害。

11月2日

省行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共长江局对四川工作的指示，表示完全接受长江局对四川工作的批评。长江局认为，四川的工作偏重于军事行动；过份估计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忽视职工运动；组织17路红军的计划不切实际等等。会议同时认为，四川党的工作应“加紧反右倾，同时必须反对左倾，不过右倾危险更大”。会议决定将四川党团组织重新划分。

12月25日

省委发出第10号通告，接受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总结执行6月政治局决议以来的教训，承认这一时期犯了左倾夸大的错误。决定停止实行普遍的暴动，认为在经过一系列暴动失败后，四川革命暂时处于“静的状态”。但仍认为全国处于革命高潮，强调四川党在反对左倾残余的同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要在主观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立即布置和准备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向中心城市发展。通告对加强反帝斗争，反军阀战争，发动工人日常斗争准备同盟总罢工，发动农村春荒斗争，发动士兵日常运动准备兵变兵暴，加强中心城市中心区域工作等方面，分别提出了要求，作出了规定。

年底

川东、重庆和省内其它地区的各级行动委员会陆续被撤销，恢复了党团组织。

根据立三路线和省行委的指示，全省先后发动了多次士兵暴动和地方暴动，这些武装起义由于指导思想错误，不顾主客观条件，均为时很短即告失败。使积蓄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损失尤为严重。

1931年

3月13日

重庆察叶巷二号省委秘书处被破坏，省委巡视员饶耿之

和总交通许仁智被捕牺牲。在此之前的1月14日，江北特支被破坏，书记和组织委员被捕，特支秘书曹雪樵（曹获秋）逃脱。

4月

鉴于重庆白色恐怖程度有增无已，环境极为恶劣，中共四川省委决定迁往成都。并决定在重庆建立川东特委，下辖重庆等40余县市。川东特委书记文强（文莱之，同年6月被捕，旋即被营救脱险，出川后投敌）。组织部长杨仁杰（杨仁叔，文强被捕后代理特委书记），宣传部长徐永弟，秘书长郑佑之。重庆设市委，书记马如龙，组织部长刘玉书（后由陈必新接任），宣传部长肖成久（后由钟丘接任），秘书长钟丘。重庆市委成立后，积极清理被破坏的党团组织，并以工厂为重点，在缫丝、军工、印刷等行业工厂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

5月28日

省委在成都召开常委会，讨论“国际路线”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接受了王明路线。会议认为，全川革命运动“必然迅速的继续的高涨”。为此，党在四川的中心任务和策略路线是发展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加紧兵士运动，造成兵变的前提，并视之为目前的中心任务，尤其是川东党组织“目前最严重的任务”；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加强反对改组派、第三党、国家主义派和取消派的运动等。同年10月，省委根据中央7月来信，把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全川党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并以此推动

四川工作的转变。全川党的工作受到王明路线的严重影响。

8月

川东特委和重庆市委撤销，成立江巴中心县委。中心县委辖重庆市及巴县、江北、江津、荣昌、隆昌、大足、铜梁、璧山、合川9县。中心县委书记马如龙，组织部长杨仁杰，宣传部长徐永弟，军支书记李家俊，秘书长郑佑之，委员兼江津县委书记陈必新（陈震）。中心县委从成立到次年1月，领导成员杨仁杰、李家俊、郑佑之、徐永弟，以及接任军支书记的李惠康（李剑钊）等相继被捕，壮烈牺牲。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发生“9·18”事变。

重庆人民闻讯奋起开展反日爱国斗争，先后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四川各界民众抗日救国大会”等组织，连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市、罢工、罢课，组织查抄日货，抗议日本侵略罪行。9月28日，全市实行绝食罢市，下旗举哀，冒雨在夫子池集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对日经济绝交，要求四川军队出川抗战。11月，重庆各界在党的发动和影响下，开展了“援马运动”（援助马占山抗日）。各团体致电慰问、献金支援东北抗日将士，近5000人报名参加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的斗争不断高涨。

但在王明路线影响下，四川省委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要是为了加紧进攻苏联，镇压中国革命，转移朝鲜的反日视线；把群众自发的抗日运动看作是国民党的欺骗行为，规定各级党组织不得参加非党发动的抗日活动，把自己的工

作局限在少数人的范围内，因而严重影响了党在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作用，丧失了时机。

9月24日

南岸王家沱日本租界租期已满（前清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8月11日，日本驻渝领事与川东道订立《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使日本取得在南岸王家沱建立租界特权，租借期30年）。重庆人民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并向市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如期收回日租界。

自1928年年底以来，党影响下的“反帝大同盟”、“反日大会”等组织曾多次提出要求收回王家沱日租界。各界群众还先后组成“重庆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收回王家沱日租界民众督促会”、“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自动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特组委员会”，以及重庆、江北、巴县的“自治促进会”，掀起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群众运动，反日怒潮高涨。经过两年多的斗争，终于迫使日本驻渝的领事、侨民和军舰于10月22日撤离了重庆。24日，市政府当局派军警接管了王家沱日租界，斗争取得胜利。但次年，日本又以看守财产为名，经国民党政府同意，派日本侨民再次回住原王家沱租界。直至抗战开始后，又才由重庆市政府当局接管租界财产，日领事下旗回国。

1932年

1月28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发生“1·28”事变，19路军奋

起抗战。

重庆人民闻讯，迅速掀起以要求川军出川抗战，制止四川内战，支援上海抗日将士为中心内容的反日浪潮。分别成立了“四川民众督促川军出兵大会”、“中国义勇军四川赴难队”、“四川停止内战大同盟”等组织。各团体纷纷集合游行，发表宣言通电。2月1日，“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勿签订亡国条约”，宣称：“对彻底抗日者当誓死拥护，对投降媚敌者当视为国贼与之共亡”，并通电全川，要求刘湘等川军将领出川抗日。3月10日，全市数万市民又举行“四川各界督促川军出兵救国请愿大会”，决议电请国民党中央惩办拖延推诿出兵的四川将领刘湘、邓锡侯。“重庆国难救济会”还提出“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协同对外，共御外侮”，“收复东北失地”，“国民自动救国”等口号。7月，重庆群众响应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运动，开展了制止内战的活动。

“1·28”事变后，重庆人民抵制、查禁日货，参加义勇军及献金支援抗日将士的运动更加高涨。重庆各团体和市民群众为支援上海、黑龙江抗日将士，慷慨捐输，大量捐款汇至抗日前方。

1月

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徐永弟和军支书记李惠康被捕牺牲，接着中心县委宣传部机关遭破坏，宣传部长黄克诚被捕自首，团中心县委亦受破坏。省委决定调整组织，中心县委书记仍为马如龙，组织部长陈必新，宣传部长闵建勋，秘书长盛一平。2月，马如龙调成都工作，由陈必新接任书记。

6月，根据干部力量和工作环境等情况，经省委同意，江巴中心县辖区由原9县1市改为江巴两县和重庆市。

1月

在反日浪潮中，南岸又新丝厂工人反对厂方供给日本军舰煤水，并提出保障工人安全的要求，遭到厂方拒绝，54名工人代表被软禁。党组织领导工人再次举行罢工，并发动江北、南岸各丝厂工人声援，迫使厂方接受了增加工资、改善伙食、减少工作时间等条件。

9月

江巴中心县委书记陈必新为叛徒出卖被捕。宣传部长闵建勋、秘书长盛一平调离重庆。后盛一平在梁山游击队牺牲，闵建勋任南充中心县委书记时在苍溪牺牲。江巴中心县委被破坏后，重庆党的组织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未得到恢复。以后党的组织缩小为江巴特支，李烈光任书记。

10月1日

四川军阀“二刘”之战爆发口以重庆为中心的刘湘21军联合川军各路军阀对付以川南为中心的刘文辉24军。这是四川军阀之间的最后一次大混战，战况空前激烈。至12月，刘文辉大败，尽弃川东、川南，退至川西边陲。次年7月，二刘再度开战，刘文辉彻底失败，残部退至雅安、邛崃边陲地区。其所弃地盘大部为刘湘占领。刘湘21军势力大为膨胀，其所至之处，“清共委员会”随之建立，大肆破坏中共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

1933年

2月7日

中共川陕省委在通江县成立。

接着，2月中旬，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自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以来，迅速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多次粉碎四川军阀部队的围攻，声势浩大，威震全川。川北一带地主豪绅纷纷逃至重庆等地，散发传单，叫喊“天不佑蜀，赤祸流川”。市内反动报刊也随之大肆诬蔑攻击红军。刘湘更强令构筑碉堡，增加赋税，并多次戒严，搜捕抗日团体人员，加紧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与此同时，重庆市区和江北、巴县的大街小巷常有川陕苏维埃的布告和拥护苏区、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的标语出现。

5月

江巴特支书记李烈光被捕，随后遇害。省委决定派廖福源任重庆特支书记。同年10月，廖福源被叛徒出卖入狱囚禁于巴县监狱和反省院，直至1936年获释。

7月7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节制川中各军，统率各军进攻川北红四方面军。

12月21日

贺龙部红三军攻占川湘鄂边的黔江县城，引起重庆方面统治阶级的惊恐。重庆一再戒严，反动派搜家查户，搜捕共产党人。

1934年

3、4月

为恢复重庆党的组织和工工作，省委直接派出5人，又从合川调3人到重庆。此外，责成泸州等地组织派人到重庆帮助恢复工作。但几经努力，重庆党的工作和组织仍未得到充分恢复。

春夏之间

由于重庆及川东地区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省委派省委常委张郅（张志）为川东工作组组长，孙照明、刘仁厚任组员，驻重庆，兼管重庆工作，并恢复发展下川东工作。

6月

红四方面军派驻重庆的交通站站长杨明善（王天洪）被捕牺牲。

10月

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酉阳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并再次

攻克酉阳县城。不久即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5年

1月19日

由谭林、陶闇、赵唯等人于上年组成的中共云阳工委，按照上海中央局指示领导了云阳暴动。参加暴动的武装约八九十人，攻击了县政府、团防特务队、县警察中队及清共委员会。因事起仓促，配合不好，行动不一，在强敌围攻下，暴动第三天即失败。赵禹、谭瑞生等8人被捕牺牲，谭林、赵唯、陶闇、温作民等先后出走上海。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川东地区发生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

1月

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一部，由遵义北上，于1月21日占领綦江石壕，威胁重庆。刘湘调集军队驻守綦江、南川、江津。后红军西进，在川南入川。

国民党中央势力以堵击围剿红军名义入川。蒋介石令贺国光率领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康泽率领军委会别动队进驻重庆。本年11月1日，重庆行营正式成立，顾祝同、杨永泰、贺国光分任主任、秘书长、参谋长。

2月

上海中央局派张曙时入川领导云阳暴动，到渝后知暴动已失败，无法与当地取得联系，遂改做地方工作。后到成

都，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并着手发展党组织。

3月2日

蒋介石飞抵重庆，4日出席四川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扩大纪念周会。蒋介石表示此次入川目的，一是督促进攻红军，二是统一川政。

夏初

省委驻重庆的川东工作组长张郅在成都被捕叛变。红四方面军驻重庆交通站负责人吴世敏等亦在成都与省委联系工作时被捕。5月，省委书记刘克谐等在成都被捕叛变，并带领特务到处捉人，破坏党的组织。到5月底，全川除个别地方党组织保存外，其余均遭破坏。少数党员继续坚持斗争。

6月18日

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至成都，随后刘湘将其军政活动中心亦移至成都。这是刘湘与国民党中央当局矛盾深化，为避免参谋团的直接压力而采取的措施。

8月1日

中共中央在法国巴黎的《救国日报》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国内各阶层人士中引起反响。《八一宣言》辗转传到重庆后，立刻引起进步人士的注意和重视。

8月

上海中央局特科为获取国民党核心机密情报，根据国民

党军事当局重心西移的形势，派陈昌到重庆，利用关系打入康泽别动总队部情报股。以后又陆续派陈仲英（陈养山）、陈克寒到重庆，协助陈昌开展工作。1936年初，陈昌、陈仲英、陈克寒接办“新四川通讯社”，陈昌为社长，陈仲英为总编辑，陈克寒为记者。他们以通讯社为掩护，获取了国民党当局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重要情报，陆续向上海党的机关报告。新四川通讯社同人与《商务日报》、《新蜀报》中的进步人士陶敬之、温嗣翔、侯野君等联络，积极发动和参加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秋，陈仲英、陈克寒返沪汇报工作，由中央代表冯雪峰调往西安和陕北。陈昌的活动引起特务的怀疑，于1937年初转万县，新四川通讯社结束。

12月9日

北平爆发党领导的“12.9”爱国学生运动。

10日，消息传到重庆，各界闻声响应。《新蜀报》和《商务日报·副刊》连日发表消息文章，揭露国民党压制抗日，阻止学生爱国运动的行为，呼吁重庆学生起来，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11日，重庆大学连夜组成“学生救国会”，重属联中、川东师范、重庆美专、巴县中学、渝女师、江北中学、治平中学、巴县农中、明诚中学、复旦中学、宏育中学等校学生相继发表宣言、发出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南京国民党政府保障一切爱国运动。24日，重庆39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114人集会，正式成立“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派出代表向当局请愿，提出即日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六项要求，出版了《救国半月刊》，在市内及近郊开展多种形式的

文艺宣传活动。与此同时，“重庆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发表《告本市同学书》，赞扬学生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亦拒绝给日轮、英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

国民党当局压制爱国学生运动，“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不到3个月即被强令解散。但学生中的进步骨干力量仍然继续联系，坚持活动，形成了学生运动的核心。

1936年

2月

从中央苏区脱险后与党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漆鲁鱼辗转回到重庆，任《新蜀报》编辑，后任主笔。他和几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及积极分子一起，利用《新蜀报》和《商务日报·副刊》两个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不断扩大团结范围，逐步形成了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6月上旬

在漆鲁鱼寓所秘密成立了“重庆救国会”，参加会议的有漆鲁鱼、侯野君、温嗣翔、陶敬之、饶友瑚、陈和玉、李余等。推选漆鲁鱼为总务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为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为干事。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形成重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逐步在文化、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工人等各界建立了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长了大批干部，为重庆党组织的

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到1938年下半年，由于党组织的建立和救国会骨干成员多数入党，重庆救国会按照党的指示逐步停止活动。

7月12日至8月16日

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的名义举办“新文字暑期讲习班”，报名参加学习的七八十人。讲习班主要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讲习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有20多人成为各界救国会的主要骨干。

7月19日

重庆职业青年读书会成立，这个组织是重庆职业青年救国会的对外名称，丁屏（丁雪松）、赵湘植、杨帆、李郁生、翟廉当选为理事。这是陶敬之在《商务日报·公共园地》上开辟专栏，引导部分职业青年就祖国命运、民族解放、个人前途等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所产生的结果。职业青年救国会是职业青年中抗日救亡活动的核心力量。

8月18日

重庆举行“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会后分6组向有关当局请愿。20日市商会代表举行游行示威，强烈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

先是6月日本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在成都设立

领事馆，并不顾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派领事岩井英一于8月11日途经重庆，西上成都，更加激发重庆人民的愤怒，掀起反日浪潮。

8月

上海中央局派回四川的张晓峰在成都发展大足县籍人刘文哲、邓耘丛入党，并指示他们成立了中共大足特支。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建的四川少数党组织之一。

9月下旬

张曙时从成都到重庆，通过学生运动领导人刘传福与漆鲁鱼联系，并了解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张曙时要求重庆各抗日救亡进步力量加强团结，发展统一战线，将公开与秘密、非法与合法结合起来，建立秘密学生组织，掌握公开的学生团体。在张曙时的指导下，重庆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促进了团结。

11月1日

救国会以重庆文化界的名义召开“鲁迅先生追悼会”，有各界人士300多人参加。通过对鲁迅的悼念活动，推动了重庆文化界进步力量的联合。

11月上旬

重庆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即秘密学联，亦称“学教会”）成立。学联主席刘传福，组织温士一，宣传罗焯寅。学教会在各学校迅速发展，在全市5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中，学教会

影响占优势的达40多所。

11月

救国会发动重庆各界开展援助傅作义绥远抗战的活动，学救会、职业青年救国会举办游艺会、劝募等活动筹集经费支援前线。同时，救国会还发起声援上海救国会“七君子”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2月上旬

漆鲁鱼布置救国会成员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所设的民众歌咏会，并成立了自强读书会。以此作为抗日宣传阵地，开展阅读进步书籍、教唱救亡歌曲等活动，团结了一批青年。自强读书会和民众歌咏会的负责人均为救国会的骨干。

12月中旬

“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在进步力量中，人心振奋。漆鲁鱼正确领会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救国会骨干成员中宣传解释，统一思想，加紧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年底

国民党中央势力不断涌入四川，与四川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经过中共代表李一氓和张曙时等人的工作，四川军阀首领刘湘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支持发动“西安事变”，派出代表到陕北与中共联络。同时释放了一批监禁的

共产党员，开放爱国运动。四川的政治局势逐步有所好转。

1937年

4月

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到成都与刘湘会谈，提出解决川事六方案，要求川军让出重庆。刘湘被迫接受，让出重庆。下旬，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并控制重庆地区。

5月16日

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公开成立，漆鲁鱼、黄宇齐、金满成、侯野君、温嗣翔、李华飞、肖崇素、赵铭彝、陈彝孙、陈凤兮等当选为理事。

文化界救国会和其它各界救国会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在此期间，除《新蜀报》、《商务日报·副刊》外，一批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发展起来，主要有：《齐报》（王达非、黄宇齐、陶敬之等编辑）、《四川日报》（杜桴生编辑，1937年3月迁成都）、《人力周刊》（金满成等编辑）、《春云》（原为银行界资助的文艺刊物，后由李华飞编辑）、《诗报》月刊（李华飞、郝威、张天授等编辑）、《银行界》（“银行励进会”主办）等。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大为加强，抗日救亡的声势不断壮大。

5月

重庆反省院中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开展绝食斗争，反对将政治犯移交国民党中央，要求就地释放。经过斗争和各方人士的支援，当局同意在两个月内全部释放反省院的政治犯。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1937年

7月7日

芦沟桥事件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重庆广大人民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重庆救国会及其所属组织立即大力开展抗日宣传与动员工作。救国会系统的抗日救亡组织有很大发展，并争取到一定的合法地位。

7月9日

国民党军委会在重庆召开的川康整军会议，因“七·七”事变爆发草草收场，这次会议于7月6日开始，由何应钦、顾祝同主持，川军各将领参加，目的是缩编川军，集权军委会，削弱刘湘势力。会议气氛紧张，斗争激烈，未达到预定

结果。会上闻抗战爆发，川军将领纷纷请缨，要求率部出川杀敌。

7月18日

青年职业互助会在市商会礼堂公开成立，这是以银行练习生和公司职员、店员为主要成分、以职业青年救国会为核心的群众基础更广泛的职业青年组织。青年职业互助会与各救亡团体配合，组织学习，开展宣传，成为重庆职业青年中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主要力量。

7月下旬

由国民党地方当局主办的“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救国会分出一定力量参加并推动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抗敌后援会初期，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战，抵制仇货，募捐慰劳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此之前的7月14日，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曾宣布：援助华北将士，只作文字上的宣传，暂不采取任何行动。

7月至8月

学生救国联合会利用暑期组织各校积极分子组成宣传队，到市内和附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这时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各学校的力量愈益发展，团结了更多的同学，发展了更多的社团，并经常利用假节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一直持续到1939年上半年。

8月初

“重庆妇女救国会”成立。不久，妇女救国会利用合法

名义，于8月16日公开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简称重庆妇女慰劳会），在妇女中广泛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募捐慰问，动员缝制寒衣，举办救亡训练班、妇女夜校，发展抗日统一战线。

8月

文化界救国会举办为期20天的暑期文艺讲习班，培养抗日文艺宣传骨干。同时，文化界救国会组织移动演剧队、儿童演剧队，深入到巴县、江北、綦江、长寿、涪陵等地乡镇巡回演出，公演了《放下你的鞭子》、《保卫芦沟桥》等抗日救亡戏剧。

9月15日

在救国会领导下，“怒吼剧社”成立。剧社到市内以及附近各县演出抗战话剧达几十个剧目，并结合进行各种生动形式的抗日宣传，在抗战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9月18日

重庆市和江巴两县各界民众在夫子池举行纪念“9.18”6周年抗敌救国大会，各机关、团体、学校近300个单位约10万人参加，会后举行了游行，群情激昂，沿途高歌，救亡歌声弥漫山城。

10月11日

南京中央大学迁到重庆，选定沙坪坝松林坡为校址。此后，上海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

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以及一批中学陆续迁来重庆。抗战初期外地学校的内迁，促进了重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重庆党组织随即在本地和内迁学校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10月

中央特派员张曙时派人来重庆与漆鲁鱼等取得联系，恢复了漆鲁鱼、杜延庆、何实嗣、郝威（郝威的关系不久即从北方转来）、黄亦人几个失掉关系党员的党籍，建立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会），漆鲁鱼为组长。重庆干部小组（会）是重庆1935年党组织被破坏后的第一个党组织。

11月20日

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达重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央机关相继迁渝。1939年5月5日，改重庆为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11月23日

以文化界救国会等单位为基础，成立了“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进一步扩大了群众基础，发展会员达800多人。“文协”发动文化、新闻、教育等各界人士，运用各种舆论阵地，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讲演会、讲习会、研究会、读书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是重庆文化界一支重要的群众抗日力量。

11月下旬

重庆救国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主要内容是传达党中

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会议听取学救会、职业青年互助会、民众歌咏会、自强读书会等组织的工作汇报，分析了当时形势，布置了任务。

11月

针对“亡国论”、“和平论”抬头，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相继召开“民众肃清汉奸示威大会”、“检讨汉奸理论座谈会”、“反汉奸游行歌咏大会”等活动，要求对日宣战绝交，实行抗战到底，加强组织民众，实行民主政权，改善人民生活；主张“主和即汉奸”。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动员舆论抨击汉奸言论，增强必胜信心。

12月

经在成都建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党的干部小组（会）改为中共重庆市工委。市工委书记漆鲁鱼，组织委员杜延庆，宣传委员郝威。以后担任市工委组织委员的还有洪勋、杨述（陈光），宣传委员黄亦人，委员黄觉庵、黄蜀澄。

年底

救国会成员和进步青年经中共重庆市工委输送去延安，先后有100多人。到1938年春夏，形成奔赴延安的高潮。

1938年

1月

在重庆市学生救国会领导和发动下，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利用寒假组织乡村宣传团，赴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自贡、富顺、泸州、合江、江津9县市的乡镇进行抗日宣传，历时27天，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年初

八路军驻重庆联络处在机房街成立，周怡任主任。联络处除开展军事联络和上层统战工作外，还积极帮助地方党开展工作。

3月

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在重庆组建七大兵工厂，并先后开工生产。重庆成为国内最大的军事工业生产基地。各兵工厂是地下党组织重点发展的对象。

4月17日

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成立。

自抗战兴起，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主要是上海地区的民营工厂的众多民族工业家，为支持抗战和免使企业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与损害，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支持下，纷纷内迁。到1940年底，迁到大后方的民营工厂共450

家，物资设备12万吨。其中迁到四川的250家，绝大多数在重庆地区。同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兵工署所属大型工厂亦多数迁至重庆。大批工厂的内迁，促进了重庆工业的大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重庆及近郊工人总数达20万人。

迁川工厂联合会是民营工厂内迁后，最早、最大的工业界社会团体。不少工业家参加了后来的民主运动。

5月

川军67军开赴抗日前线，重庆市工委派黄宇齐等人，以怒吼剧社街村演剧队为基础，组成18人的“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军出征，向部队和沿途各地群众宣传演出。

自1937年9月，川军出川抗战，部队分东、北两路出发开赴前线作战。抗战期间，四川共有六个集团军及部分独立师、旅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征募近300万壮丁参军。四川军队出川抗战得到全川和重庆人民人力、物力、财力以及舆论的热烈支持。

6月

中共四川省工委派廖志高（汪平）到重庆，在市工委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重庆市委。市委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杨述，宣传部长漆鲁鱼，执委黄亦人、郝威、王一清。9月，市委设立工人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分别为王一清、杨述（兼）、黄亦人。市委成立后，立即执行中共长江局放手发展党员的指示，并逐步建立了市内各级党组织，市委成立时，全市党员仅60余人，6个

党支部；到本年10月底，市委所属党员900人，其中市区650人，分布在城区、新市区、沙坪坝、南岸、江北5个区和海委，共58个支部中。同时，重庆市委还领导川东部分地区党的组织，在这些地区发展党员。重庆市委所属的市外党员250人中，除江巴两县乡镇中的党员外，分布在北碚特区、铜梁、丰都县委，邻水、大竹、合川、江津、綦江、大足、石柱、涪陵特支中。

7月

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国民参政员董必武自武汉到重庆，发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在与重庆市委负责人谈话中指出，党组织要创办自己的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市委贯彻这一指示精神，抽派负责干部开展这一工作。

10月10日

重庆庆祝全国第一届戏剧节，开展广泛的抗日戏剧演出活动。

本年1月1日，在汉口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时，决定每年10月10日为戏剧节。此时因武汉外围战事吃紧，大多数剧团撤至重庆，重庆成为第一届戏剧节的活动中心。有21个演出团体参加演出，在各剧院、街头轮流上演话剧、歌剧和街头剧约40个剧目。演出活动持续至11月1日，观众达10万人次，取得收入全部捐献给抗战前线。

10月25日

武汉沦陷。在此前后，国民党中枢迁至重庆。大批政

界、军界、经济、文化界人士相继到达重庆。重庆成为大后方的中心。

10月25日

《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1947年2月28日被迫停刊，是我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由《新华日报》社编辑的《群众》杂志（周刊），是我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1946年后转到上海、香港等地出版，直至全国解放。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革命真理，指导地下党的工作，是国统区革命舆论的中心和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10月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到达重庆，着手筹组重庆办事处。1939年春在机房街70号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撤销八路军驻重庆联络处。次年5月，机房街房屋被日寇飞机炸毁，办事处迁至红岩嘴13号，直到1946年8月办事处撤销。在近8年的时间里，办事处代表我军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军事情况、军需供给的联系，为我军筹集经费、物资和输送干部，特别是承担了掩护秘密的南方局机关的重要任务。

10月底

据重庆市委统计，市内工人党员已有312人，占市内党员

总数650人的48%，其中产业工人占34%，手工业工人占14%。自市委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派干部深入工厂企业开展工作。在军工、邮电、航运、矿山、机器、纺织、印刷等行业的一些重要企业中建立了党的支部。

11月21日至25日

中共四川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廖志高作为省工委委员和重庆市委代表出席。扩大会根据长江局指示，决定撤销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建立川西（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川东特委成立时，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李应吉，宣传部长漆鲁鱼，工委书记王亦清，青委书记杨述，妇委书记陈奇雪，秘书长李维。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下属城区区委、沙磁区委、下城区委、新市区委、化龙桥区委、江北县委、巴县工委，以及海员工委。川东特委下属组织先后还有巴县中心县委、北碚（合川）中心县委、万县中心县委、丰石中心县委、梁大中心县委、泸县中心县委、宜宾中心县委（1939年10月划归川康特委领导）南充中心县委（1939年9月由川康特委划归川东特委领导）、涪（陵）长（寿）忠（县）丰（都）石（柱）5县工委，以及荣昌县委，綦江县委和一些直属支部。到1939年9、10月，川东特委所属党员约3600人，是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的时期。

12月中旬

周恩来叶剑英抵达重庆。

周恩来坚持至武汉沦陷前夕，与叶剑英等撤离武汉，经长沙、衡阳、桂林、到重庆。随即与国民党中央当局会谈，

与民主人士讨论抗战动员问题；并先后应邀到沙坪坝南开中学、重属联中发表讲演，就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青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责任等问题进行论述，鼓励青年们努力学习，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12月18日

《新华日报》举行义卖献金日，动员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前线。重庆党组织和各救亡团体组织大中学生、工人、职员、妇女儿童组成150个义卖队参加义卖。各界人士踊跃义买，献金救国，盛况空前。

12月

北碚中心县委（亦称合川中心县委）在北碚特区委基础上成立。北碚中心县委领导北碚、合川、铜梁、邻水、大足、璧山等地党组织，一度领导过广安、武胜、潼南等地党组织。中心县委成立时，沈钧为书记，组织部长兼工运部长江浩然（白戈），宣传部长兼青委书记方朴德（杨永直）。

年底

由于重庆救国会骨干成员大部分入党，在各抗日群众团体大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根据川东特委决定，救国会各级逐步停止活动，自行消失。

1939年

1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

1938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调整了各地组织机构。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代表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1939年1月5日，决定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13人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1月13日，决定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16日，南方局向中央报告，完成内部分工，在重庆正式成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7年多的时间里，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大后方党的建设，领导华南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并对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创立有着重大影响。

同月

重庆各团体、各界人士强烈声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揭露汪精卫自绝于中华民族的反动实质，批判了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要坚决打击卖国的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政策。

同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仍主张抗日，但把“抗战到底”只解释为“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同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秘

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次会议成为国民党的政策转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起点。随之，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指出对国民党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根据发生变化的形势和中央指示，南方局和川东特委不断采取措施，使川东和重庆党组织逐步从大发展转为巩固党，党的活动从半公开转入隐蔽。

4月下旬

根据形势变化和中央及南方局指示，川东特委作出《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规定严格禁止各级组织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停止上下级组织业务部门单独的联系与会议；禁止上级组织越级调下级干部谈话，减少交通和通讯联系。开始着手从组织上巩固党。

4月

南方局、川东特委和重庆各级党组织相继分别举办党员学习班，分批集中一部分党员干部，主要学习抗战以来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党员干部的集训持续到下半年。

5月1日

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杨述（陈光）在重庆工人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场旁被国民党宪兵逮捕。经南方局营救，杨述才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名义获释。6月，川东特委组织部干事赵万齐亦被捕。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在重庆压制进步力量，开始破坏中共党组织的重要信号。

5月3日、4日

日寇飞机对重庆进行轮番大轰炸，造成极为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八路军办事处机房街、棉花街住地亦被炸。随后，办事处迁至红岩村。由于大轰炸造成市区内的混乱，川东特委结合巩固党的精神，对市区各级组织进行清理和调整。

6月

12日，国民党包围袭击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留守处干部，制造了“平江惨案”。在这前后，国民党顽固派还制造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反共事件，并在各地迫害中共人员和进步人士，破坏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反共高潮。针对这种形势，南方局于本月29日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所属组织立即坚决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间好转而斗争。川东特委根据中央指示，一方面积极巩固党的组织，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反击投降逆流的斗争。

7月20日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在北碚开学。育才学

校聘请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担任教师，学校的党支部由南方局组织部直接联系。育才学校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为党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

8月25日

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已成为当前极端严重的任务，“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应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川东各级党组织将工作重点转入整顿、巩固组织上来。

8月

中共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省委、特委青委负责人10余人，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委员胡乔木从延安来参加会议。会上，冯文彬作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胡乔木作关于宣传问题的报告，中央青委委员、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作关于学生运动的报告。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关于精干组织，隐蔽力量的方针，研究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如何开展青年工作。强调克服“救亡作风”，利用合法及多种形式保存骨干。会后，南方局青委将暴露的干部一部分撤回延安，一部分调换了工作地区。

9月

江津县特支书记王世焕被捕叛变，造成江津县党组织的破坏。这是抗战以来川东地区第一个被破坏的县以上党组织。

9至10月

川东特委领导重庆工人运动，开展了一系列改善职工生活的斗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政策走向反动，形势日趋逆转，物价上涨、职工生活困难，抗日活动的自由亦遭剥夺。为此，在中央纪念“七七”两周年宣言后，川东特委职工运动的方针明确体现为巩固抗战基础，反对妥协倒退，争取改善职工生活，发动职工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用各种形式组织和团结工人群众。这一时期职工运动主要有：9月，中国无线电公司反对无理解雇工人，要求增发解雇金的斗争；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工人要求发放生活津贴的斗争，市邮电报务员要求加薪的斗争。10月，大明纺织厂工人反对资本家打骂工人和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以及川江海员先后多次发起的反对拉丁，反对大批裁员，要求增加工资，增加解雇金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大都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同时，在斗争中创造和发展了一些新的团结群众的组织形式。为电政职工创办的伙食团，海员的追悼职工死难大会，公共汽车公司的技术学习小组，大明纺织厂的宿舍小组等。这些灰色合法的组织，成为掩护党的干部，领导群众斗争的有力工具。

10月

川东特委在市中区柑子堡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特委委员和中心县委书记有廖志高、李应吉、林蒙、王致中、荣高棠、陈奇雪、李维、李亚群、李莫止等10余人，南方局负责人博古、凯丰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南方局指示，着重讨论了巩固党的问题。会议决定：加强党内思想工作，教育党员提

高党的基本知识，并对党员进行秘密工作训练、纪律和气节教育；审查干部；停止组织发展；彻底转变抗战初期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做深入细致的个别工作；隐蔽撤退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干部。

1940年

1月22日

汪精卫与日本政府于1939年12月30日签订的卖国密约被披露。《新华日报》从23日起，接连发表社论痛斥卖国投降言论，重庆各界人士和人民团体再次掀起反对汪精卫卖国投降的高潮。针对3月30日成立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反汪运动继续高涨，重庆还成立了由冯玉祥任主任的铸像筹委会，准备铸造汪逆夫妇的跪像。进步舆论界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逆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汪精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通过反复掀起的讨汪批汪运动，使得汪精卫和一切汉奸卖国贼声名狼藉，使得暗藏的投降派有所顾忌。

1月

中共重庆市委重新建立。市委书记由川东特委工运部长王致中担任，组织部长郭汶、宣传部长赵利锋、妇委书记汪敏、委员兼城区区委书记甘丹。同年9、10月，王致中、赵利锋郭汶先后调离，市委改组，由江涛（莫止）接任书记，

汪敏接任组织部长，刘传福接任宣传部长兼江北县委书记。市委所属有城区、新市区、化龙桥区（同年6月撤销，所属组织划给新市区委）、沙磁区（同年8月划归重庆市委领导，在此之前，沙磁区中心区委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江北县、巴县。市委建立后，继续加强党员的教育，进行巩固党的工作，党的发展基本停止。

1月

重属联中发生反对学校当局开除进步学生的学潮。在川东特委青委直接指导下，长寿特支和学校党支部采取正确的策略，抓住反动校长贪污公款、摧残教育等劣迹，团结大多数师生，向各界发出呼吁。《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支持，社会各方亦纷纷表示同情和援助。迫使教育当局接受学生们提出的撤换校长，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不追究参加学潮的师生等要求。学潮在取得胜利的条件下适时结束，并保护了党的组织和学运骨干。

3月8日

在南方局妇委的推动下，“全国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在重庆召开“三八”纪念大会，1万余妇女参加。妇女界进步人士相继发言，一致强烈声讨汪精卫，要求团结抗战，保障女权。会后发起的妇女界反汪签名运动，持续到9月中旬。在整个抗战期间，妇女界进步力量在重庆都比较活跃。

3月14日

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陷害共产党，趁

机查封《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逮捕川康特委和分销处的负责人罗世文，抗日群众领袖、共产党员车耀先等10余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起严重的反共事件。南方局起草了“告同胞书”，揭露事实真相和国民党制造的阴谋，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在成都等地散发。成都“抢米事件”前后，国民党特务在四川各地破坏中共党组织。川东地区先后发生南充中心县委、梁大中心县委以及5县工委所属组织遭破坏事件，一些共产党员被逮捕，环境日益恶劣。党领导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基本停止。

5月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应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对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应是“有理、有利、有节”，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迫加入国民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和一般团体应广泛打入之；在国民党部队中应广泛开展交朋友的活动。党的基本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要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国统区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隐蔽起来。这是抗战中期以后，中央对国统区基本工作方针的一次最全面的指示，成为国统区工作的指南。

7月2日和6日

南方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川东党的工作。廖志高在会上报告了半年来川东和重庆的工作。叶剑英、博古、邓颖超、孔原、刘晓在会上发言认为，川东是国民党直接统治地区的中心地区，情况特殊，环境最艰苦困难；川东的工作经过努力取得了成绩，但不能乐观，川东的党组织还没有完全巩固；今后应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特别是川东，更是长期的工作方针。周恩来最后作结论，对川东党的工作，就时局、工作估计、斗争策略、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组织工作、审查干部、肃清内奸、秘密工作方法等问题，以及特委与南方局的联系方法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会议之后，川东特委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在前一段加强巩固党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隐蔽方针，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工作方法，主要包括：党的各级组织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建立平行组织，严禁发生横的关系；实行精干政策，减少各级委员会，必要时只一人负责，不成立委员会；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机关、从事上层活动与下层活动的干部严格分开；党员和干部作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及时转移有暴露危险的人员，党员转移后，实行转地不转党；充分利用合法，参加到合法团体，以至国民党党政机关中去，通过广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工作；利用各类社会关系作掩护，等等。

由于隐蔽方针的贯彻，在国民党发动的几次反共高潮中，川东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未受到严重破坏，主要领导机关和骨干力量基本上得到了保存。

8月

由于内奸邹韻宜的破坏，江北县委委员向德仑被中统特务逮捕。以后又数次发生江北县党组织被破坏，党员被捕的事件，并牵连到重庆市内川东特委、重庆市委紧急疏散了三任县委书记，并派人清查内奸。到1941年春，邹韻宜的面目暴露。

8、9月间

根据南方局决定，孔原在巴县木洞镇建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西南工委以孔原为书记，钱瑛、廖志高、于江震、蔡书彬等先后为委员，负责领导川东特委、川康特委、贵州省临工委、云南省工委、湘鄂西区党委的工作。同年冬，孔原在木洞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南方局获悉后立即通知孔原返回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派钱瑛为西南工委书记，去成都组织机关。是年冬，因环境恶劣，钱瑛撤回重庆。1942年春，西南工委撤销。

10月

川东特委决定成立巴县中心县委。中心县委辖巴县、綦江、南川、长寿、永川、荣昌、隆昌、江津等县和黔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以及重庆市内部分党组织。巴县中心县委机关常驻重庆，与重庆市委平行开展工作。

1941年

1月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南方局、川东特委、重庆市委均组织力量秘密散发中央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及有关材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

1月

“皖南事变”后，形势急剧恶化，南方局遵照中央的通知，紧急疏散党的骨干。周恩来精心安排进步文化人撤离重庆，疏散到香港、桂林等地，保存了重要的革命力量。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在国统区破坏中共地下组织。3月，泸县中心县委被破坏，不久，梁大中心县委被破坏。川东特委采取紧急措施，进一步实行隐蔽方针，对组织进行清理，对党员进行审查。根据党员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继续保持联系，保留关系，切断关系等处理办法。经过清理整顿，川东和重庆的党组织党员人数减少，各级组织的干部大都转移地区活动，只留少数干部进行单线联系，组织更加精干，骨干力量得以保存。

3月30日

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和重庆大学师生热烈祝贺软禁中的重

大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新华日报》送去寿联。重庆大学师生在校园内修建“寅初亭”，以为纪念。马寅初因公开揭露抨击四大家族祸国殃民罪行，于上年12月被蒋介石下令软禁。这次祝寿活动，实际上是党组织和民主进步力量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反民主逆流的一次抗议和反击。

5月

8日、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指示要求坚决彻底地执行隐蔽方针，并规定了具体办法：例如：坚决地勇敢地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即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支部；一般不开支部会，仅个别接头；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一般不设书记、组织、宣传，只设个别特派员、工作人员；党员或党的机关与上级失掉联系，须独立工作，不准到处找党。指示还重申了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应彻底无保留地执行。同年夏，南方局召开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讨论部署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参加了这次会议。

9月1日

重庆大学学生反对国民党分子梁颖文校长，并将之驱逐。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解散重庆大学，6日，《新华日报》报导了这一消息，短评《教部解散重大》被新闻检查当局扣发。各界人士纷纷声援重大学生。经过斗争，梁颖文被迫辞职，重庆大学复校成功。

10月10日

中国戏剧节公演活动在重庆展开。这是1938年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所倡导的活动。南方局为打破皖南事变后重庆沉闷、压抑的政治空气，大力推动这项活动。由于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重庆多雾，敌机轰炸基本停止，为躲避空袭而下乡的文化界人士和各剧团大都返回市内，这个季节成为戏剧演出和各种文艺活动的黄金季节，开展了大量的雾季公演，由此发展成为“雾季艺术节”。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群众性的抗日运动无法展开，进步文化界遂转入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尤其是作为面向群众宣传抗日、宣传民主重要手段的话剧，得到蓬勃发展。从本年到1945年连续5年的雾季艺术节，仅演出的大型剧目即达100多个。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等先后演出了《大地回春》、《棠棣之花》、《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蜕变》、《风雪夜归人》、《清明前后》等剧。其它如小说、美术、音乐、诗歌等文学艺术活动也得到广泛发展。

11月16日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和安排，重庆文化界和各方面人士举行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大会。重庆是文化人的集中地，是抗战文化的中心，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文化大军是进步势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郭沫若是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这次纪念会对文化界工作是有力的推动，也是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政策一次有力的回击。以后在重庆多次举行的祝寿和庆祝创作生涯纪念活动，是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的一种活动和工作

方式。

12月8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驻香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香港、广东党组织和华南游击队抢救了大批在港文化人脱险。其中一部分转移到重庆，进一步加强了重庆文化工作阵地。

12月至次年1月

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作总结讲话，指出，为了贯彻中央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必须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为此，地下党员要成为隐蔽的，得力的和联系群众的干部。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要使上层和下层工作，公开和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时机一到立刻可以起来战斗”。稍后，周恩来又提出了每个共产党员要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任务，使隐蔽方针更加具体化。

1942年

年初

南方局青年组根据隐蔽时期地下党停止组织发展，而一些进步青年要求组织起来接受党的领导这一情况，首先在重

庆，以及成都、昆明等地的部分大学中着手建立“据点”。这是一种没有统一名称，没有固定形式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到本年底，青年组直接间接联系的各“据点”进步青年有252人，其中重庆186人。以后，“据点”继续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已在一批大中学校、工厂、公司中建立起来，团结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积蓄了革命力量。1944年以后，在“据点”工作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昆明“民主青年同盟”，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形成了党在南方国统区几个较大的外围组织。南方局妇女组、经济组也建立各种形式的“据点”。“据点”活动是隐蔽时期党在国统区开展青年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的特殊的形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

由于重庆市委原领导成员均已先后调离，市委再次改组，王璞（石果、孙仁）任书记，彭咏梧、何文遹为委员。在这一届市委时期，重庆市内党的各级委员会大都不存在，只保留一些单线联系的关系。散处各地各单位的党员通过定期的接头或通信与组织保持联系，积极执行“三勤”任务，站稳脚跟；在社会职业掩护下，努力学习，充实自己，个别联系群众，结交朋友，开展调查研究；少数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学习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有的打入国民党党政机关或社会团体，掌握部分权力。一些暂时失掉关系的党员，通过各种办法找党，除个别经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帮助恢复关系外，一般只保持工作联系。1943年以后，重庆市委的工作主要在南方局组织部的领导下进行，并一直持续到1946年3

月。

4月3日

中国剧艺社在重庆演出郭沫若新编历史剧《屈原》，轰动山城。《屈原》的创作和演出是对国民党反共政策和投降暗流的揭露和抨击，是抗战文艺的重大发展。围绕《屈原》的斗争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

6月8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新华日报》发表了整风学习文件，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干部参加整风学习班。川东特委和下属组织亦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党员进行整风学习，从思想上、作风上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质量。

1943年

3月15日

《新华日报》以“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为题，首次在国统区报导了毛泽东1939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消息。在此前后，南方局在从事文化工作的党员和进步人士中组织学习讲话。重庆的一些地下党员亦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讲话内容并开展学习。

5月1日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歌乐山下正式成立。这是由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局和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进行情报、气象、电讯方面的合作，并由美方为军统训练和武装特工人员。这里后来演变成监禁、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大集中营。

5月22日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表示赞同。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6、7、8月调集四五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发动几十次挑衅进攻；叫嚣解散中共，交出边区；刁难迫害《新华日报》。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在重庆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这一反共阴谋，董必武等奔走于重庆各界人士之间，做了大量工作，引起强烈反响。在解放区军民的坚决反击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指责下，国民党被迫停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9月

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调到南方局，川东特委撤销。另在川东地区成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书记分别为孙敬文、曾淳。上下川东特委均未建立集体领导机构，书记住重庆。重庆市委和北碚中心县委由上川东特委领导，巴县中心县委由下川东特委领导。1944年，上下川东特委均撤销，重庆市委和巴县中心县委由南方局组织部领导。

本年

中央大学的“据点”，巧妙地控制了三青团骨干分子办的壁报《太公报》，为我所用，后来发展成为四开铅印周刊《大学新闻》，在学生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4年

3、4、5月

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组成的宪政促进会和宪草座谈会连续在重庆举行会议，讨论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宪草原则等问题。董必武参加了这些会议。在此前后，重庆文化、青年、妇女等各界亦相继举行各种座谈会。国统区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

4月12日

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行第七届大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局减轻工矿负担，挽救工业危机，取消经济统制政策，实行生产自由。民族工商业者对民主的要求日益迫切。

7月

“中国学生导报社”在北碚复旦大学成立。12月23日创办了公开刊物《中国学生导报》。“中导社”是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以复旦大学为基地，由一些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所组成，以后在重庆的一些大、中学校学生中

秘密发展，成为重庆地区校际性的秘密进步组织。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人员的增多，“中导社”在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中国学生社”。

同月，由重庆一部分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于1941年成立的“青年民主社”与南方局青年组取得联系，并接受其领导。青民社积极参与了以后兴起的民主运动，和民盟等民主党派有密切的联系。

秋

在南方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一些共产党员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在重庆和巴县创办了蜀都中学，亚洲中学（后迁至重庆，改名民建中学），次年又在江北创办莲华中学。新建了一批中学“据点”。

9月15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一主张立刻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响应，成为大后方兴起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

9月24日

宪政座谈会第七次会议在重庆举行。到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500余人。董必武、冯玉祥、张澜、黄炎培等发表演讲，指出，再不民主，唯有亡国。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10月1日

重庆举行追悼文化界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邹韬奋于7月24日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根据邹韬奋本人生前请求，追认为中共党员），宋庆龄、郭沫若、董必武、林伯渠及各界人士800多人出席。与会者在发言中强烈要求消灭法西斯统治，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10月10日

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千余师生参加国庆纪念晚会，教授张志让、周谷城和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刷新政治，团结全国，实现民主，挽救抗战危局。学生们激昂地喊出：“要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行动”。在此前后，重庆的其它大学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11月7日

中共中央决定，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返回延安后，在重庆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组成，王若飞任书记。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实际与南方局相同。

12月

日军攻占贵州独山，消息传到重庆后引起震动。国民政府一度准备迁都西昌。在此之前，日本侵略者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起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丧土失地，一触即溃，暴露了国统区政治、军事、经济的腐败现象，引起人民群众

的强烈不满。蒋介石为加强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利用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于10月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南方局为了一旦日寇进攻四川，就地发动游击战争，并且为了抵制蒋介石号召青年从军的骗局，先后派遣一批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上下川东的广安、大竹、渠县、达县、宣汉、南川、石柱、万县、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地，与当地党组织结合开辟和发展工作。虽然以后日军撤退，游击没有打成，但党在这些地区发展了农村工作，建立了一批“两面政权”，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武装，为解放战争期间的武装斗争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45年

2月20日

国民党特务田凯枪杀前往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检查违章用电的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制造了“胡世合惨案”。激起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南方局决定因势利导，发动一次群众运动，打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南方局王若飞直接领导，南方局青年组刘光、朱语今、张佛翔等组织下，工人群众广泛采取各种方式，控诉特务分子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许多工厂、学校、团体发表声明和宣言，声讨特务罪行。10天之内，以工人为主前往吊唁胡世合的达20多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于26日枪毙了凶手，并抚恤胡世合遗属，斗争取得胜利。这是在重庆地区党组织长期隐蔽之后，由南方局直接领

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斗争，标志着重庆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2月

在南方局组织下，重庆文化界发起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签名运动，在郭沫若起草的《对时局进言》上签名的著名文化界人士有300余人。《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自由之法令；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之政策，枪口一致对外；严惩贪赃枉法官吏及奸商；对英、美、苏采取平行外交等六项具体意见。

在此之前，重庆妇女界著名人士104人联合署名发表对时局的进言。要求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给人民自由。

4月23日至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总路线。《新华日报》发表“七大”文献，并印成小册子散发。重庆地下党采取各种形式组织党员和进步群众学习。这对后来重庆地区党组织的发展，民主运动的高涨，产生了重大影响。

6月

“七大”以后，出席“七大”的川东地区代表和其他在

延安的川东地下党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和“七大”精神，召开“山头会议”，对川东党组织在抗战后重建以来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与会同志个人也作了总结。会后，部分人被派回川东工作。

6月至8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育才学校驻城办事处等“据点”，发动组织先后多批共510人左右到中原解放区。次年4月，南方局外事组，青年组又组织选送81名懂英语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张家口解放区。

7月

经南方局批准，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据点”的基础上，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共发展社员100余人。抗战胜利以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东迁，同时多数社员被发展入党，这一代新青社在重庆没有保持下来，而在宁沪杭地区得到发展。

8月14日

日本政府照会中苏美英四个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次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告无条件投降。重庆人民沉浸在狂欢之中。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重庆举行庆祝胜利大游行，全市万人空巷，热烈庆祝经过浴血奋斗的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11)

1945年

8月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全国人民在欢庆胜利的同时，渴望实现国内和平。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毛泽东与蒋介石数次会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治中、张群、邵力子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和王若飞由张治中陪同飞返延安。

8月底至10月10日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在周恩来等人协助下，与重庆各方面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接触，交换意见，宣传解释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使各中间力量增进了对中共的了解，促进

了民主力量的团结和壮大，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在中共南方局的关怀和支持下，上层民主力量陆续发动和组织起来，科技界组成了“九三学社”，工商界代表人士筹组“民主建国会”。“九三”、“民建”与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民主实践社等团体先后发表对国是的主张，一致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和团结。《中华论丛》等10大期刊社联合出版专刊，接着是26家大型杂志联合发出呼吁，要和平，不要内战。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在渝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是主张，坚决支持中共在谈判中的立场。民盟代表大会还清除了青年党势力，成立了新的民盟中央，从而成为中共在与国民党谈判中的重要同盟者。

10月19日

周恩来在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上作《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设想和保护、发展民族资本、对待劳资关系等政策，对团结争取工商界具有深远影响。在此前后，在南方局支持下成立了“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重庆工业界发动扩大请愿，要求政府召开工业复员会议，拨款帮助工业界复员；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协重庆分会召开紧急大会，经理厂长百余人到行政院请愿，要求政府解决经济、生产和营业问题，并联合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从速召开政协会议，实现和平。

同日，周恩来在纪念鲁迅的集会上向陪都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共500多人讲话，希望文化界参加政治协商，依靠人民，建设民主的新文化。与会人士表示要“跟着鲁迅的道

路前进”。

10月

根据南方局指示，组成了党的重庆地区工人运动领导小组，重庆市委书记王璞任组长。成员温静涛、侯旭东。领导小组在重庆关庙开会确定工运的任务，是以反内战、反独裁为中心，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在这一时期，重庆的工人运动发展很快。9月20日，永兴机器厂等27个工厂的工人发表联合声明，揭露国民党当局和资本家使工人在抗战胜利后处于失业、饥寒的威胁之下，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改变自身的厄运。10月，惠昌铁工厂等8个民营厂的工人参加了党影响的进步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同月，重庆5万多失业工人选出代表成立失业工人请愿团。11月，各民营工厂失业工人又选出代表500人组成请愿团向当局请愿，提出安置和救济失业工人等要求。10月至11月，新胜布厂、渝鑫铁工厂等工厂的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1月14日，重庆机器、纺织、军工、化工、印刷等行业的工人，联合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

同月

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成立。工人民主工作队是抗战时期在据点形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队员主要分布在机械、印刷两个行业中。在以后的斗争中，大多数队员被发展为党员，并在武汉、南京等城市开展工作。

11月13日

复旦大学等30多个文化教育单位强烈呼吁和平，反对内战。27日，重庆各大学学生致书美国学生，呼吁美军退出中国，要求一致行动阻止美国政府资助国民党加剧内战。12月2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5院校学生，签名反对内战，并提出立即停止内战等三项国是主张。

11月19日

重庆各界人士500余人集会，成立“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郭沫若、陶行知、黄炎培等在会上讲话。会议制定了章程，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包括罢工罢市罢课等方式来制止内战；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拒绝内战。会议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1月

重庆市委王璞派出李家庆、江伯言组成工作组，对原北碚中心县委所属组织进行清理。上一年，由于北碚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被特务发现而紧急转移，中心县委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经过清理，部分原北碚中心县委所属组织和党员，包括一些上川东地区的党员与重庆市委重新取得联系。

12月1日

国民党在昆明制造“12·1”惨案。消息传来，重庆各界人民群众极为震怒。各民主党派和民众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和

广大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声明，发出通电，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学生站在斗争前列，成立“12·1”惨案后援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昆明爱国学生的罪行。12月9日，在南方局青年组的发动和组织下，在长安寺举行追悼大会，公祭“12·1”死难师生，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1万余人参加大会。一致要求惩办祸首，取缔特务组织，保障民主和自由。公祭连续举行了3天。

12月15日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恢复南方局，目前暂称重庆局，由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另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

12月

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中国职业青年社”和“陪都青年联谊会”，分别在本月和次年1月成立。这两个组织是在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建立的，由南方局青年组联系。

1946年

1月10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同时，国共双方对各自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会议经过21天，于1月30日闭幕。政协会议的召开和取得一定成果，给山城人民带来和平民主的希望。

望，推动了重庆民主运动的开展。

1月11日至27日

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主持，先在重庆合作会堂后改在沧白堂连续举行民众大会，邀请出席政协会议的各方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国民党特务分子多次破坏捣乱会场，侮辱谩骂报告人郭沫若、王若飞、梁漱溟及李公朴、李德全等，殴伤到会群众，制造了“沧白堂事件”。但民众大会坚持继续举办，先后开会8次，对动员群众，配合政协会议的会内斗争，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月15日

社会大学开学。这是在南方局的领导和支持下，由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的一所以学习革命理论为主的新型业余夜大学。社会大学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党的活动和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1947年3月，社会大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但同学们自行组织起来，坚持学习，坚持斗争，直至解放。1948年初，该校建立了党的支部。

1月25日

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由中央大学新青社发动重庆学生万人大游行。参加游行的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等1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队伍游行到国民政府向政协会议请愿，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提出7项国是主张。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向学生代表讲

话，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其他党派代表也讲了话。这次学生运动，对政协会议的成功起了促进作用。

2月1日

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创刊。《民主报》与《新华日报》紧密配合，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月10日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3个团体联合发起在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参加大会群众近万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布置特务暴徒捣乱会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大会主席团的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和新闻记者、劳协会员60余人被暴徒打伤，经到会群众奋力抢救，始得脱险。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团和政协参加单位代表人士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新华日报》及重庆进步舆论界连续发表评论和文章进行抗议和揭露；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分别组成“二·一〇血案后援会”，慰问受伤人士，发表声明抗议特务暴行。

2月22日

国民党借东北问题和“张莘夫事件”，煽动不明真象的学生，制造反苏游行。混在游行队伍中的特务分子趁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报》馆，打伤《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惩办祸首，赔偿损失。同时发表谈话，指出爱国主义与排

外主义的区别。

3月21日

重庆29兵工厂（大渡口钢铁厂）工人10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23日，全厂工人集会，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代表。特务警卫大队开枪镇压，打死工人4人，重伤8人，轻伤多人，制造了“三·二三惨案”。《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揭露特务暴行，并派记者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在此前后，民生机器厂、中国毛纺厂、天府煤矿等10多家厂矿企业进行罢工、怠工、请愿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大部分厂矿的工潮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

3月

根据形势的发展，南方局组织部决定加强重庆市党的工作，成立新的一届重庆市委。市委书记仍由王璞担任，副书记刘国定，委员彭咏梧、骆安靖。新市委还领导上川东各地及下川东部分地区的党组织。4月，重庆市委在江北黑石子开会决定，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在清理和恢复原来失散的党组织关系，着手发展新党员，逐步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

4月8日

中共代表团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以及2月被释放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出席世界工联代表大会回国的邓发、从延安来渝慰问“较场口事件”中受伤人士的黄齐生等13人，在由重庆飞返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全部遇难。18日，重庆市各界数千人在青年馆举行“四·八烈士追悼会”表示要继

承烈士遗志，为新中国奋斗。

4月19日

中共代表团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委员傅钟（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社代社长）、于江震（组织部长）、魏传统（秘书长）、杨超（社会部长）、程子健（统战部长）、梁华（《新华日报》社党总支书记）、郑伯克（云南省工委书记）；候补委员周文（宣传部副部长）、何其芳（文化组组长）、赵世兰（妇女组组长）。四川省委实际上又是中央的代表机关，领导川、康、云、贵四省和《新华日报》的工作。30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四川省委成立，并介绍省委吴玉章、王维舟、傅钟与公众见面。7月以后，王维舟等相继调回延安，由张友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和《新华日报》社长，袁超俊为秘书长。以后省委机构缩小，只留少数精干班子坚持工作。

省委成立后，继承南方局的事业，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地下党的建设，继续推进民主运动，并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扩大内战发动的突然事变。省委除领导重庆市党的工作外，还直接领导了重庆市的各种进步运动。

4月

在重庆的一些全国性群众团体陆续复员东下后，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在重庆成立了一些公开的群众团体。一些公开的刊物先后创办，如《活路》、《徬徨》、《科学与生活》等。这些组织和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7月

由四川省委妇女组领导的“重庆妇女联谊会”成立。在1945年7月，由南方局妇女组领导建立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抗战胜利后多数成员转到外地）留在重庆的成员组织起来筹建了重庆妇女联谊会。重庆妇女联谊会在组织动员上层妇女参加民主运动和反对内战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月3日

中共代表团和重庆局在周恩来率领下迁南京，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四川省委由南京局领导，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四川省委书记的公开身份驻重庆。

6月

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重庆人民加紧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四川省委发动下，重庆各界人士4000多人，于6月19日和24日两次联名致电国共两党，反对内战，要求以谈判解决问题。同时，各群众团体纷纷致电国共两党，呼吁和平。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界人士并举行为期一月的和平祈祷会。

7月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进一步加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杀害了民主战士李公

朴和闻一多。这一新的暴行在重庆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怒和强烈抗议，28日，重庆各界人士6000余人在青年馆举行“李、闻追悼大会”，情绪至为悲愤。会后50多个团体和各界知名人士组成“李、闻血案后援会”，发表宣言，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奋斗。25日，民主战士陶行知为忧国忧民，劳累过度，在上海病逝。8月4日，重庆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1000余人为陶行知举行追悼会。9月20日，重庆各界人士2000多人再次为陶行知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又一位为民主而献身的战士。

同月

鉴于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省委指示重庆市委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加强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从各方面支援农村工作。重庆市委以华蓥山区附近的广安、岳池、武胜、渠县、合川、江北、梁山、邻水、大竹，下川东的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县，以及黔北的思南地区为重点，陆续派出干部，并动员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同时加紧当地组织的清理恢复与发展。在农村工作中，一方面从抗丁、抗粮、抗捐入手开展农民运动；一方面掌握部分基层政权，为发动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8月6日

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和工贼流氓，将中国劳协重庆办事处及其所属机构工人福利社、劳工医院、美工堂电影院等用武力强占，并逮捕劳协工作人员38人。四川省委和重庆各界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对劳协表示支持和慰

问，外国工会亦致电声援，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大部分被捕人员。

9月29日

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等20余团体分别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和苏英美各国领导人，要求美国纠正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对华政策。同时响应美国人民的“美军退出中国周”，呼吁美军立即退出中国。

10月17日

国民党警察总队巡逻队在江北民生机器厂开枪打死工人秦春生，激起全厂工人的愤怒。该厂工会理事长、党所联系的进步工人、劳协会员张国雄领导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发动1000余工人抬棺游行请愿，向当局提出三项要求。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0月、11月

重庆发生“失业军官请训团事件”。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非嫡系的云、贵、川、康籍军官大量遣散。在重庆的4000多名失业军官自发起来斗争，成立了失业军官请训团。中共四川省委指定张子英负责，派出党员在失业军官中进行工作，发动数千名失业军官请愿，要求收回集训，解决生活问题。他们不顾当局的镇压，两次包围重庆行辕和重庆警备司令部，并绝食抗议，发出“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口号。国民党当局被迫让步，答应将失业军官收回集训，同时逮捕了请训团的主要骨干。

11月4日

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使国统区更加殖民地化。在美国货冲击下，重庆工商业萧条，生产停滞，企业倒闭，民生凋敝，失业工人已超过10万。中美商约的签订，更加激怒了重庆人民。各界人士纷纷集会反对中美商约。12月，各界群众发动签名运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参加签名的达万人以上。群众中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11月14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发表声明，民盟不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此前4天，重庆21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分裂的国大，坚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1947年

1月2月

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重庆学生掀起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立即掀起抗暴斗争。1月3日，31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重庆大学开会，成立了“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推选女师学院学生汪盛荣为抗暴联主席，决议3日至7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并于

6日举行了15000多人的游行示威，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滚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等口号。各界人民团体也成立抗暴组织，配合学生的斗争。抗暴大游行后，继续举行“抗暴宣传周”，10多所大中学校组成宣传队，在重庆各处广泛宣传，揭露美蒋勾结的罪行。2月5日和8日，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进行抗暴宣传的学生，致伤多人。为此，重庆大学、女师学院、乡建学院等23所学校再度罢课。为避免过分暴露，继续造成损失，省委引导学生停止街头宣传，把活动转向校内，加强培养在抗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组成各校的核心力量。

2月28日

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堵死国内和平大门，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撤退。国民党重庆当局派出军警包围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馆，强令《新华日报》停刊。省委和报社全体人员在吴玉章率领下，维护共产党人的气节，坚持最后的斗争。除个别人员外出未能回到省委和报馆，因而留渝转入地下外，全体人员于3月7日和9日安全飞返延安。

同一日，《民主报》亦被查封。

3月1日

《新华日报》被查封的消息传开，引起进步群众的强烈义愤。民生机器厂工会理事长张国雄，将1946年2月1日载有政协决议全文的《新华日报》公开张贴在厂门贴报栏内，在工人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应。张国雄于3月4日被警备司令部下

令逮捕，后牺牲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4月

四川省委被迫撤离后，重庆市委先后派刘国定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局委员钱瑛取得联系。上海局领导指示重庆党组织放手开展工作，并责成重庆市委书记王璞清理联系川东地区党组织。5月以后，重庆市委陆续与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万县地区涂孝文和秀山地区邓照明等负责人建立联系。一些原与省委和《新华日报》直接联系的党员，也先后与重庆市委接上关系。

5月

由宁沪平津学生首先发动，在全国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反蒋独裁的国内第二条战线。5月20日，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被国民党军警打伤多人。重庆学生奋起声援，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重大、女师学院等校于24日开始罢课，各校学生决定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倡议，准备于6月2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和游行示威。

6月1日

国民党政府为镇压学生运动布置了一次全国性大逮捕。重庆当局于凌晨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分头逮捕了各校学生运动骨干和新闻、教育、文化、出版、工商等界进步人士，共计270余人。被捕人员在关押中坚持斗争，经社会各方营救，除3名共产党员后来牺牲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外，

都陆续得到释放。“六·一”大逮捕使重庆方兴未艾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镇压下去，未能发展成高潮。

7月

为了把学生运动骨干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形成核心，重庆市委决定建立党的外围核心组织，为表示对“六·一”大逮捕的仇恨永志不忘，故名“六一社”。“六一社”以党长期联系培养的学生运动骨干为基础，迅速发展，到年底已有社员300多人，分别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成为地下党的得力助手，在各项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月

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创刊。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几个与党失掉联系的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根据香港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上的消息，编印了几期传单式小报，在进步分子中传阅。7月，与市委接上关系，市委决定在“无名小报”基础上发行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建立了《挺进报》特支。同时，市委建立了“电台”支部和几处收音站，负责收听新华社广播消息，为《挺进报》提供稿源。《挺进报》主要通过地下党组织系统发行，遍及重庆和川东许多地方，产生了重要影响。9月，市委决定发行机关刊物《反攻》，以刊登政论性文章为主，10月出创刊号，发行7期后停刊。

9月

王璞到上海向上海局钱瑛汇报请示工作。行前，王璞与

川东各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取得联系，交换了情况和意见，草拟出《川东农村工作提纲》，“提纲”中分析了川东地区的形势及各种矛盾，提出了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的意见。经共同讨论同意，由王璞带往上海。此时，川东各地党组织经过清理恢复，大都接上了关系。10月，王璞回到重庆传达上海局钱瑛指示：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加强城市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在农村武装斗争中，多搞小型游击队，一般不搞打旗号的大规模武装起义。

同月

北区工委在江北特支基础上成立，齐亮任书记，领导的范围包括江北县和北碚部分地区。北区工委以蓬华中学（以后改为志达中学）为活动基地，除发动工人农民运动和发展组织外，重要任务是支援华蓥山地区武装斗争，并为党提供经费。在党组织领导下，工委委员王朴动员母亲金永华先后变卖田产1400多石，价值黄金1000多两，全部交党使用，成为川东地下党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以后王朴等人在重庆开办南华贸易公司，是川东地下党的一个重要经济据点。

10月

根据上海局钱瑛指示，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由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肖泽宽、刘国定、彭咏梧为委员。

川东临委改组重庆市委为重庆市工委，由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为常委，许建业为委员；建立

上川东地工委，驻广安，由王璞兼书记；建立下川东地工委，驻万县，由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川南地工委驻泸州，仍由廖林生任书记，余时亮、李培根先后任副书记；1948年4月建立南（川）、涪（陵）工委，驻南川，由李治平任书记，刘渝明任副书记。

川东临委成立同时撤销了巴县中心县委，肖泽宽分管川南和南涪地区工作，1948年初任川东临委秘书长。

重庆和川东地区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县委、县级工委和特支。各地区各系统的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许多在抗战中失掉关系的党员与党重新取得联系，一大批在民主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月

川东临委派彭咏梧从重庆带一批干部前往下川东，部署云（阳）奉（节）两巫（巫溪、巫山）的武装斗争；派邓照明为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加强梁（山）、达（县）、大（竹）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派出一批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华蓥山区，与当地党组织配合，准备武装斗争。同时，通知川东各地党组织积极做好发动武装斗争和支援策应的准备。

12月25日

毛泽东在陕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报告很快传到国统区，重庆党组织进行了传播和学习，对坚持地下斗争鼓舞很大。

1948年

1月8日

云（阳）奉（节）两巫（巫溪、巫山）武装起义开始发动。根据川东临委指示，下川东工委决定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首批起义重点地区，并成立“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赵唯为司令员，彭咏梧为政委。下属奉大巫支队，巴北支队、七南支队，后又成立开县支队。奉大巫支队首先与云阳南溪和巫溪西宁同时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100余人。两处起义队伍在奉节青莲乡集中后，遭敌人重兵围剿。1月16日，彭咏梧率基干队转移到奉节鞍子山，遭敌人包围，彭咏梧等突围牺牲，部分干部战士被俘，余部转移。其他几支部队又先后分别在云阳、湖北利川、奉节、开县境内发动几次战斗，均取得一定成绩。后根据中央指示，将武装力量化整为零，分散作群众工作。

1月17日

上川东一工委在达县虎南区开会，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出席。会议决定扩大武装，加紧巩固梁山、达县、大竹边境的虎城、南岳、大树地区和大竹后山区，以及开县境内的游击区，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工委这三个地区共掌握300余人枪和部分区乡政权，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从2月2日开始派兵对三个游击区进行围剿。经过一个多月迂迴游击，终因寡不敌众，游击队分别撤离到广安县境内和大竹石桥。

3月底，一工委一部分干部撤到重庆。

2月18日

川东临委在重庆举行会议，王璞传达从川康特委转来的上海局钱瑛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能起特殊作用的对象，可以发展为特别党员；开展对敌攻心，强化敌人的危机感；发展农村两面政权。会议分析了局势，回顾检查了前一时期工作，总结了奉大巫起义失败和梁达大地区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暂不发动全面起义，而着重于准备工作。根据加强对敌攻心的需要，会议决定改变《挺进报》的发行方针，从以对内发行为主改为主要寄给敌方人员，报纸内容亦作相应改变。

4月

因《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委负责人叛变，引起重庆和川东党组织连续发生重大破坏。自年初《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以来，多次寄给敌人大小头目，引起敌人震动。4月1日，工运干部任达哉被捕叛变，带领特务逮捕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坚贞不屈，但欲说服看守特务为其带信出狱，为特务出卖。特务守伺许建业工作单位志成公司，4月6日逮捕欲与许接头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刘隐瞒市委书记身分，但出卖梁达大地区起义失败后转来重庆的邓兴鄴和李忠良，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破坏。4月16日，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冉叛变，并供出在押的刘国定身分。刘进一步叛变。刘冉先后出卖了他们所知道的川东临委、重庆市工委、上川东地工委、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

关和主要干部，并带领特务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地下党组织。在这一事件中，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除宁沪8人外的125人中，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牺牲）35人，获释、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叛变投敌的8人，造成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极为重大的损失。

5月

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和秘书长肖泽宽先后在璧山、铜梁开会，研究刘、冉叛变及重庆市党组织被破坏的善后事宜，决定由梁达大地区撤回重庆的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留在重庆，处理善后，清理组织。

7月上旬

王璞在岳池罗渡召开上川东七、八两工委负责人紧急会议。鉴于刘、冉叛变和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被捕（随后叛变），大量组织遭破坏或暴露，难以隐蔽，乃决定背水一战，发动华蓥山周围数县联合大起义。会议决定打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的旗号，以王维舟名义为司令员，王璞任政委，由曾霖实际负责军事指挥，各起义地区按党的工委编号成立支队。这一决定立即传达到起义地区党组织。

8月10日

重庆高等特种刑事法庭成立。这是根据国民党政府于本年8月公布的《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成立的。目的是接

照国民党政府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和《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革命活动。8至10月，重庆特刑庭先后逮捕、传讯和通缉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十人。同时在《挺进报》事件中被捕的部分共产党干部亦交特刑庭审判。在法庭上被捕者和敌人坚持了各种各式的斗争，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至次年初，随着国民党请和，特刑庭撤销，被捕者一部分得到保释，有的直至解放时才脱险出狱。

8、9月

根据罗渡会议决定，华蓥山地区武装起义相继发动。从8月10日到9月20日，在广安戴市和观音阁、武胜三溪、岳池伏龙、合川金子沱和武胜真静、渠县龙潭等地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共有2000多人枪，分别宣布成立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八、七、三、四、六支队。华蓥山起义在重庆、成都等地引起巨大震动，国民党重庆行辕和四川省政府立即调动重兵前往围剿。起义部队在战斗和突围时，王璞和五支队司令员杨玉枢、三支队政委杨翼勤等人不幸牺牲，各处起义均遭失败。突围后部队多数人员分散隐蔽，干部转移，少数人被捕。华蓥山起义失败后，在起义地区的大竹、广安、邻水、岳池等地还保留下来几支小型武工队，开展以自卫为主的游击活动，有的一直坚持到解放。

9月

因重庆、川东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上海局钱瑛从北平、上海的川籍党员中调出一批干部到重庆开展工作。到年

底以前，这批干部中少数与川东党组织接上头，大部分的关系交给川康特委领导。同时，川康特委亦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重庆，并将川康党组织在重庆的干部建立了四个平行的工作组：学运工作组，川西第二先遣组，交通工作组，工商工作组。四个工作组大都从开展青年工作入手，迅速发展组织，建立据点，与川东党组织平行开展活动。

11月初

邓照明由重庆到铜梁与肖泽宽接上头，交换了情况，总结了川东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的经验教训，统一了认识。决定在农村不再搞大的武装起义，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小型武工队，也不大量发展党员，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川东临委所属组织在大破坏期间，除川南、南涪两工委和铜梁、长寿、荣昌、石柱等县以及重庆个别组织保持完整外，大部遭受巨大破坏。此时已经过清理，又逐步恢复起来，但与上级尚未取得联系。9月底邓照明曾到上海找上级组织，因上海局分管西南工作的负责人钱瑛已去香港，未得结果，只留下一信通过上海党组织转给钱瑛，向领导报告了川东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

12月上旬

在大破坏中保持组织完整未受损失的城中心和南岸学运特支，积极寻找关系与香港的上海局钱瑛处取得联系，特支书记赵隆侃到香港，返渝后通知邓照明，邓于12月下旬到香港与上级取得了联系。

12月

根据上海局领导指示，在重庆“六一社”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此前后，川康党组织在重庆亦分别发展了“民主青年同盟”（后改为“民主青年联合会”）和“民主青年协进会”。随后又建立了“重庆青年学生联合会”、“重庆市职业青年联合会”、“中华青年学习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几个平行的地下外围组织。1949年4月，川东党组织系统还建立了“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谊社”。到解放时各外围组织共有成员约千余人。这些组织在各项斗争中，特别是在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

1月

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21日，又宣告“引退”，推出李宗仁代理“总统”，企图利用谈判争取时间以便卷土重来。31日，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精锐师团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直出长江，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及汉口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1月

邓照明从香港回到重庆。随即与肖泽宽在江津碰头，传达上海局钱瑛的指示：全国解放在望，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重

点必须从农村转向城市，实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发动群众保护城市，保护工厂学校，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工作，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不再搞农村武装起义。由于原川东临委只剩下肖泽宽一人，上海局决定成立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

川东特委成立后，陆续派出干部到各破坏地区继续清理恢复组织。此时川东地区除原来未受破坏的组织外，没有建立新的集体领导机构，大多实行单线联系。重庆市内的工作由邓照明直接领导。

2月至4月

在党的领导下，重庆爆发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大规模学生运动。2月下旬，首先是大学师生开展罢教罢课，接着其他各类学校陆续投入，要求增加工资、增加公费，增加配给。3月17日，4000余学生举行请愿游行。3月27日，上万学生在重庆大学广场举行“活命营火晚会”。运动从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政治斗争。4月1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屠杀要求接受中共八项和谈条件的学生。全市学生更加义愤，进一步掀起了争生存的斗争高潮，并决定4月21日举行全市抗议示威游行。报名参加游行的大中学校和学生分别占全市学校和学生总数的1/3和80%以上。学生运动得到各阶层市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部分政府公务员也参加了罢工。

重庆党组织在得悉敌人准备镇压消息后，为避免造成损失，说服学生改为分区分校游行。当天，沙磁区、南岸海棠溪、江北盘溪和许多学校内，在敌人重重警戒下分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4·21”后，运动转入各校内部，

作深入细致的工作。通过这次运动，广泛动员了群众，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为迎接解放保护城市作了思想准备。

3月

民主同盟利用国民党放出“和谈”空气之机，由张澜向李宗仁交涉释放政治犯，在重庆，由民盟范朴斋与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具体交涉。经过上下多方的努力，渣滓洞监狱释放了21名民盟成员，其中部分人又是共产党员。

4月20日

川东特委书记肖泽宽奉命赴香港。5月，特委副书记邓照明亦奉命赴港。随即转入解放区。在此之前，已有一部分干部先后调到香港学习，少数回渝坚持工作，大部分由钱瑛同志带领进入解放区。肖、邓离开后，川东地区的工作，指定刘兆丰、卢光特、李治平、李培根负责，刘兆丰为召集人，后吸收蒋仁风、熊杨参加领导。刘兆丰、卢光特并负责重庆市的工作。

4月21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险，一举摧毁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5月17日，武汉三镇解放，27日，上海解放。

7月初

川东党部分干部进入解放区随部队到武汉后，由钱瑛主

持，对四川地下党的工作进行总结，川东党的干部肖泽宽、邓照明、黄友凡、李家庆、江伯言、赵隆侃等人参加。在对1947年以来川东党的工作总结中，既肯定了成绩，肯定了川东地下党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高尚品质，也认为1948年的大破坏和**华蓥山**起义失败，在主观上是由于领导上的左倾冒险造成的。钱瑛对川东地区党的工作提出了要求，随即派江伯言秘密返渝传达。

为了培养干部，取得经验，钱瑛安排川东党在武汉的大部分干部参加该市的接管工作。并决定把川康特委在川东的关系交川东特委领导，把川东特委在川康的关系交川康特委领导（实际上解放后才接通关系）。

7月中旬

川东特委临时负责人在临江路45号举行会议。会议根据“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讨论了加强统战、策反和保护厂护校，以及营救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中政治犯等项工作的办法。会上还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在原川南一工委、二工委地区和上下川东地区分别成立江津、荣昌、泸州、江（安）长（宁）、古蔺、綦南、涪陵、丰都、万县、长寿、铜梁11个中心县委和合川县工委，其余地区仍实行单线联系。在重庆市，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分别设立若干领导小组和特支。

7月

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一封电报中指出，以第二野战军主力经湘西、贵州入川，由贺龙率18兵团从陕南

入川；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西南局，经营川康滇黔四省。

17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

中旬，刘伯承，邓小平在南京召集二野高干会议，制定进军西南与川黔作战的方案。

同时，中共中央、二野前委任命中共重庆市委和川东区党委主要成员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张霖之、曹荻秋、魏思文等人，确定陈锡联为重庆解放后的市长。

8月24日

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29日召开军事会议调整部署以阻止人民解放军入川。蒋在重庆时，下令杀害杨虎城全家和分批杀害政治犯。

8月下旬

邓小平、张际春、宋任穷、段君毅在南京颐和路5号接见肖泽宽，听取了川东党工作的汇报。并决定在武汉的川东党干部转到南京，随二野三兵团和西南服务团一道进军四川。

9月2日

江伯言到重庆向党组织传达7月武汉会议精神 和钱瑛的指示。内容是坚决贯彻“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注意保存力量保护城市，停止党的组织发展，切忌暴露，着重加强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护厂护校，保护城

市的安全。

同日，市内发生大火灾，损失惨重，当天，国民党重庆当局准备举行的10万人反共大游行，被迫取消，国民党当局乘机嫁祸共产党，逮捕“嫌疑犯”，滥杀无辜。

9月

川东党部分干部由武汉到南京，向二野前委报到。邓小平、张际春、宋任穷，李达等二野首长接见了四川地下党的干部，并再次听取了川东党的工作汇报。邓小平等给予慰勉，指示地下党要保存力量，配合解放军接管重庆。

同时，二野前委从三兵团、后勤部队、华东局和西南服务团等单位抽调2470人，作为接管重庆的骨干力量。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朱德总司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10月14日

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在此之前从广州迁到重庆，其军政要员亦纷纷逃到重庆。

10月

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关解放西南的会议。19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指出：西南重心是四川，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23日，刘伯承、邓小平

下达二野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29日又下达进军川黔作战的补充命令。

同时，在湖南常德，二野三兵团首长和川东党负责人共同商讨接管重庆的具体办法，研究确定重庆市内和川东各地县的主要干部配备。

11月1日

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在湘鄂川黔边境发动强大攻势。二野三兵团11、12军和四野47军迅速挺进川东南，连克秀山、酉阳、黔江、彭水、武隆、涪陵、南川等县城，11月27日占领綦江，锋芒直指国民党政权的巢穴——重庆。

11月中下旬

党领导下的护厂护校工作加紧进行。许多工厂、学校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护厂护校组织。针对国民党当局以兵工厂和发电厂为重点进行破坏的行动，工人们奋起斗争。大渡口钢铁厂的共产党员刘家彝、简国治和15位工人一起，在搬走敌人埋下的炸药时英勇牺牲。21兵工厂的工人在党组织领导的护厂联谊会发动下，把敌人强行堆放的炸药全部撤除。大溪沟电厂工人用武力阻止了敌人爆破队进厂。全市除少数几处被炸造成损失外，到解放时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

11月26日

二野刘邓首长命令11、12、47军速歼长江南岸之敌，视机占领重庆。27日，毛泽东致电刘邓，提出向重庆方面攻击

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队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当日，刘邓回电提出尽早占领重庆的计划和理由。28日凌晨，毛泽东致电刘邓，同意二野尽早占领重庆的计划。当晚，解放军部队占领李家沱、马王坪。29日占领海棠溪和木洞。

11月27日

敌人在仓皇逃跑前，在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进行疯狂的大屠杀。根据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国民党特务从9月开始即分批进行屠杀。9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及秘书宋綺云等6人被杀害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11月27日，屠杀达到顶点，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鋳等近200人被杀害。11月29日，城区“新世界”临时看守所中的32人被押至松林坡杀害。前后被杀害的共300多人，仅有35人脱险幸存。

同日

党组织派蒋仁风在《商务日报》仓库楼上设立策反指挥部。经过事前大量有效的工作，驻重庆市内及江津的两个师举行起义，按照地下党的要求，做到了维护城市治安，放开通道，迎接解放军进城。游弋在长江上的国民党江防舰队7艘军舰亦表示起义。

同时，经过长时期的统战工作，重庆工商界代表人物发动起来，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解放时工商各界基本做到生产不停、营业不停、交通不停、供水供电不停。

11月30日

重庆解放。邮局党组织当即以全体职工名义，打电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消息。下午，川东地下党和重庆市各界代表过江到海棠溪，与进军部队接头，迎接解放军入城。傍晚，解放军分数路进驻市区。当天，社会大学同学在“胜利纪功碑”（现解放碑）上升起迎接解放的第一面红旗。

12月初，解放军与重庆地下党举行会师大会。地下党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此时全川东有地下党员1万多人，其中重庆市有党员488人。

编 后 记

这本《中共重庆地方党史大事记》从1983年着手编撰。当时提供材料和参加编写的单位有：重庆市博物馆历史部、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红岩革命纪念馆资料陈列部、歌乐山烈士陵园资料部、重庆市档案馆。曾两次印发征求意见稿，得到许多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的热情帮助和具体指正。但由于史料缺乏，好多难点、疑点、空白点一时难以完全弄清，以至迟迟未能正式定稿出版。近年来，中央档案馆和四川省档案馆发掘并公布了一批珍贵史料，省内市内党史工作者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有可能对《大事记》进行充实和修订，基本上弄清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史的主要进程。但是现在仍然感到这本《大事记》有许多不足，错漏之处难免。希望得到老同志、党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本书由胡康民、曾康执笔，黄友凡、卢光特、钟修文校阅。

编 者

1991年1月10日

